

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

逆流中的砥柱：今日聖人——軍中小人物的畫像

以「今日聖人」四個字來描寫奉公守法、保國衛民的軍人，是極為恰當的，但我要加重語氣地用「奉公守法，保國衛民」來描寫那些够資格被稱為「今日聖人」的軍人。因為正如同任何社會和團體一樣，軍中也不全是「奉公守法，保國衛民」的好人。事實上，有許多壞人，他們利用職權，甚至利用武力，魚肉人民、虐待部屬、吞空吃缺、貪污腐敗，其罪惡可與奸商劫收人員媲美「美」。更有草菅人命、任意斬殺，平日為非作歹，戰時降敵叛國之流，何能一概而論地以「軍人」一詞把他們也包括在內，稱做「聖人」呢？本文不擬對這種壞的軍人多加介紹，以節省篇幅。無疑的，根據筆者親自觀察和經驗，絕大多數的軍人，尤其是基層幹部和士兵們都是奉公守法、吃苦耐勞，對國家社會只有付出和貢獻，毫無取得和享受的。

正如前面所說，國民黨政權內的同志幹部，也絕大多數都是有報國理想和崇高志節的，但在一個法制未上軌道，社會是非標準尚未建立的時代，每每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粒老鼠屎可以污染一鍋湯」，一小部份人的敗德亂分，也可以破壞大部份人的善德節操啊！這也就是我為何不惜詞費，一再強調國家的長治久安，必須建築在民主法治基礎之上。唯其民主，人人才有平等自由權利，無懼於權勢財富，可口

誅筆伐，可擇善固執。唯其法治，社會正義可得維持，是非標準可以建立，可除暴安良，可懲一儆百。下面便是一些軍中小人物的畫像，至少在當時是够資格被稱爲奉公守法、保國衛民的「聖人」的。

從他們身上所看到的犧牲美德，也可反映出軍中和社會上成千成萬同樣的好人，值得謳歌，值得崇拜。至於後來他們的發展如何，有無成就，志節有無變化，則非我所知。個人所知者，在個人讀到的一些名人傳記，或新聞人物特寫中，是很少有人的志節操守，爲國家社會自我犧牲和受苦受難的程度，可以與他們相比的。

一、愛國愛人的魯國強同志：湖南安化人，初中畢業後，激於敵愾投筆從戎，離鄉別母，隻身遠征，一心欲以生命與日敵一拚，以雪國恥。在軍中與我一樣，同是二等列兵，但他被分發在戰炮連，駐地與我迫擊炮連只隔一個小山。週末例假，因同鄉關係常玩在一起。魯君爲人爽直，具標準湖南驃子個性，對所賦子的任何使命，不計艱苦，不問公平，必全力以赴，以抵於成。長官同志均敬愛之。且是非觀念甚深，其所認爲非者，雖長官朋友亦必力爭；是者，必不計譏譽支持始終如一。對同志朋友長官，態度無分軒輊；忌吹拍，恨欺凌，重然諾，不食言。惟受人欺壓過甚，引起驃子脾氣發作時，也極難妥協。人皆以其有骨氣和寶氣，以「魯寶」呼之而不名。魯寶也是屬於較年輕的一羣，長我一歲。復員後與我同入貴陽青年中學讀高一，刻苦力學，成績軋冠全班。我好動，他內向，同室而居，同室上課，成爲摯友，情同手足，他對我生活之照顧與學業之指導，影響大而受益多。徐蚌會戰失敗，政府南遷，我校奉命解散，我等

聯袂再度從軍，同赴重慶受訓，同被分發川東前線組訓民衆，至最後我們同在忠縣，共軍壓境，他嚴促我設法逃生，並以其多年刻苦儲蓄所購之金指環折半交我，以充旅費。我乃得就道，間關赴渝，與家叔取得聯繫，於重慶失陷前夕飛臺，得有以後的生命和事業。飲水思源，魯寶功不可沒。魯寶之偉大，猶不止是上述各節表面上之意義，實係其報國熱誠，刻苦精神，向上志氣，忠實友情令人感動難忘。分別業已三十年，願魯寶尚在人間，待國土重光之日，當覓機良晤圖報也！

二、一生爲國的趙班長：前面描寫我入營之初，首先見到的長官便是趙班長（已忘其名），其作風已經介紹，不再重複。只知他是十一、二歲起便參加了軍隊行伍，自然沒有受到正規教育。然其見識之廣，爲人處事經驗之豐富，甚至領導能力之高超，實超過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書呆子，或養尊處優的公子哥兒。可惜入營兩、三個月後，這些行伍出身的老班長們便被師部自從軍青年中選訓的士官所取代，各自回到原來的戰鬥部隊，上前方去打日本鬼子了。以後他的行踪，便有如浮萍，不知被時代的洪流沖擊到什麼角落去了。我們的關係真是有如「萍水相逢」，但他們對領導我們習慣於軍中生活，功不可沒。那安份守己，奉公守法，無企無求，以營作家，不顧生死，任勞任怨，爲國盡瘁的人格和操守，更使我至今難忘。每一念及，不禁肅然起敬。他們真是替社會國家付出了一切，沒有取得任何報酬，與一些巧取豪奪，佔盡國家社會便宜的聰明人相比，便可立即發現「偉大」與「渺小」的意義爲何！可是當今社會觀念和價值，似乎完全反是。哀哉！

三、銅筋鐵骨的陳排長：班長上面的直接長官是排長。我的第一個排長叫陳可人，湘西某縣人，軍校畢業。年齡大概二十四、五歲，可是那時他便已經參加過好幾次戰役，包括長沙會戰，而且帶過花。在他那鋼鐵一般的健壯軀體上，曾經被敵人機關槍的子彈留下十幾個創口和疤痕，可是他從不以此炫耀，有人問及，也輕輕描淡寫地說，表示那原是每一個軍人應該有的經驗。認為他自己只是沒有戰死疆場，獲得馬革裹屍歸葬的榮譽，比起成千成萬餓死病死的壯丁，被敵機炸死、刺刀殺死、子彈射死的將士平民，自認已屬上帝保佑，國家恩澤，而圖於有生之年，繼續奮鬥，以圖報効。我對陳排長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那制式教練動作的標準，和儀容的威武。記得在故鄉讀小學和中學時，學校牆壁上除掛着許多口號、教條，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第一，勝利第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最後勝利是我們的！」和民族英雄畫像、飛機坦克圖案等外，還有國軍基本教練的姿勢示範一類照片圖畫等等。當時很羨慕那些身體健康、挺胸直背、儀容煥發的軍人。然而，平日所看到的一些真實軍人，大多是營養不良，面黃肌瘦，武器陳舊，衣服破爛的形象，那也是國困民窮和制度沒有建立的結果。到青年軍後，才看到許多理想中的軍人，而陳排長就好像是我少年時從圖畫上看到的那些軍人一樣，每一個動作都令人羨慕。所以開始制式教練時，他總是被營長或連長請出來作模範，一舉手，一投足，確實不同凡響。

陳排長對待士兵就如同是一個大哥一樣，他因受過教育，高中畢業後再入中央軍校，所以文化水平比前述的班長們高，而且具有殺敵報國的理想和大志，也沒有自卑感。操練以外，與我們就如同兄弟，無話

不說，彼此期勉，彼此照顧。這批年輕的排長們對我們這些初次離家別親的青年人，實在貢獻很大，他們使我們瞭解國家的意義，和軍人的天職。最重要的是，他們的親切友情，使我們這些初生之犢有安全感，並未因遠離親友故鄉而精神崩潰，反而以營作家，磨礪以須，志同道合，為抗日救國而精誠團結。

四、鬱鬱寡歡的於連長：於啓俊連長是我在迫擊炮連的最後一任連長，那時抗戰已經勝利，我團奉命作小幅度的改編，將所謂優秀士兵集中編入機槍第三連，開始軍官教育。挑選過程是先由各連保送，再由機三連的長官面試決定。機三連的連長是曾在清華大學畢業再入軍校的胡其傑少校，我被於連長保送後，經胡連長口試。他先讓我讀一篇英文軍事雜誌的文章給他聽，然後問問大意。我雖只是初中畢業的學歷，但因初中是在教會辦的信義中學讀書，很重視英文，加上在迫擊炮連時，連指導員和幹事們都是大學畢業，英文、日文程度都不錯，常在一起學習，蒙他們指導，也曾有些進步。當我大膽地讀完那篇英文時，胡連長不大相信我才初中畢業，以為我至少高中畢業，加上過去參加射擊比賽、作文比賽的優勝紀錄，於是認為我很優秀，接納了我，成爲他連上幾個年紀最輕的士兵之一，那時我才剛滿十七歲。

於連長是貴州人，不是冠冕堂皇的人物，也不是好學深思型。軍校畢業後南征北伐，走遍大江南北。本來是在新一軍當連長，遠征滇緬，因其老長官張欽安爲我六一四團團長，懇邀其來團服務，這在當時是很盛行的用人方式。一個將領，常有任用老部下的風尚，一方面是前述用私人的傳統，一方面也是情誼，只要是在人事法規允許之下，是無可厚非的。

於連長應召前來，也沒有辜負老長官的期許，接任迫擊炮連連長後，肆意整頓，不到幾個月便使該連成爲全團的模範連。舉凡內務整潔、武器保養、生活訓練各方面，都受到好評。他待人也很誠篤，但不苟言笑。他對我特別有好感，常囑我去連長室談談。我因從小不喜歡被人過於寵愛，在任何團體總是避免與有地位的權威人物建立特殊關係，却願意在普通環境中奮鬥，成績常常達成特殊地位。由於很少單獨與他接觸，甚至因此曾引起過他的誤解，以爲我瞧不起他。後來我告訴他我的哲學後，他才諒解我的苦衷，因我不願意讓同志們以爲我在拍馬屁，受到連長優惠待遇。

事實上，我當時因與副師長劉樹勛（後升師長）將軍一家很熟，承他們把我看成家人，尤其是劉夫人黃修祖女士待我如子姪，看到我志氣很高，而身體文弱，常常關懷我能否吃得消軍中艱苦的生活和嚴格的紀律，有時會打一個電話給團長囑爲照顧。副師長來團視察時，也會特別問到我的情形，如正值我在隊伍中操練，被他看到，他會走過來寒暄幾句，這在軍中是不得了的事，當事人如不檢點，便很容易趾高氣揚，自認是特殊階級，引人討厭。我不但不如此，相反的，更爲負責守紀，服從長官，自重自愛，因之也更爲他人所尊重。於連長到後來才知道我與副師長的關係，而我竟年輕知所收斂，從不提及，更對我器重有加。由於我不多去他的辦公室，有時半夜輪到我站崗時，他會因視察衛兵或查哨之便，站在樹下與我對面交談一陣，勉勵我努力向上，前程無量云云。他特別對我有事關係而不炫耀利用一點表示敬佩，認爲那是一種崇高的品德。他指出一位叫夏尊賢的同志，也是與劉副師長相識，但不及我與副師長關係的深厚，

劉夫人也從來沒請團長照拂過，却在連上隨時以特殊階級自居，又不好好受訓，結果迫得連長不得不予以處罰，終至請調離連，覺得十分可惜可恥。

也是在這種方式的談話中，我知道於連長報國的初衷，和經歷的艱苦和危險。他也是在戰鬪中帶過花、受過傷的英雄。他那時年已三十開外，因家在貴州，父母盼其返里完婚，他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心襟未敢從命，父母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來信訓示，他以「移孝作忠」自況。他有時也會在「忠」、「孝」之間感到爲難，因他爲長子，家貧親老，而從軍以來，未嘗有分毫接濟父母，以充甘旨之奉。良心上也感到有對不起父母養育之恩的地方。我聽了十分感動，但認爲這也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國家受強敵侵凌，經濟破產，政治不安定，大部份的中國人，凡不投機，不貪污犯法，不自私自利者，都是如此。我家的壯年兄叔，也是遠戍滇緬，或從事游擊，或服務中樞，在整個民族求生抗敵的堅苦奮鬥中受苦受難。盼望嚴冬趕快過去，讓溫暖的春天趕快降臨才好。

承於連長的提拔，我升了副班長，職務是負責內務的整理和公差勤務的分派，包括起床後牀鋪被席的摺疊、環境衛生和廁所清潔的打掃。職責增多，但待遇依舊；我應該說待遇全無。我們當時除吃飯穿衣外，是沒有別的特遇的，薪水是象徵性的，一個月薪水，大概可到小鎮的麵食店吃幾碗陽春麵，或糯米湯丸。我們是來報國的，報國便應該不問待遇，是嗎？

於連長有過一次對我影響深遠的談話，那是有關「領導才能」的問題。他看到我在副班長職務上的表

現不錯，但似乎不是憑領導組織的才能，而是任勞任怨的成績。每次公差勤務，他說他看到我一個人從頭到尾忙個不停地在親自動手動腳地做，這種以身作則的精神值得嘉許。但他告訴我，真正有領導組織才能的人，應該懂得如何使部下都能發揮每一個人的力量和才能才對，單憑以身作則去做個不停，所能完成的非常有限，要做到衆志成城才好。他說：「我作連長，假如凡事都要我親自去做的話，我做死了也不一定做得完。所以我必須使我的部下連附、排長、班長等，每一個人都有分配的任務去完成，加以組織、督導，全連的成就便很可觀了……」我聽了深以爲然，而且受到啓示。同時發現這就是爲何迫擊炮連在他領導下成爲模範連的原因。由於他的領導有方，他下面的排長們也是個個賢能，至今記憶猶新。如孫道玉排長、蒲成山排長、關一舟連附等等，當時都是勤勉能幹，忠貞爲國的青年幹部。聽說他們後來有的隨軍到了臺灣，我因脫離了軍界，也就無緣再見。但他們的楷模，永留記憶！

勝利以後，於連長情緒有些低潮，也可能是受到「忠」、「孝」不能兩全的問題煩惱，以及事業前途的考慮。也因為這種情緒上的低潮和變化，在一次長途行軍後，因夜間集合未能符合團長的要求，招致一場極爲難堪的事件。我在前面以「甚麼東西」爲題的一段故事，便是指此，文中幾乎挨團長腳踢的人，便是於連長。此次事件後，於連長更加心灰意懶，一連睡了三天。他告訴我，他很諒解團長「唯吾獨尊」的態度。尤其想到在新一軍幹得好好的，憑他一個電報相召，來此報效，到頭來受此侮辱，實在有些想不開。他說，他已決心提早退伍，回家去種田，得兼侍候老父弱母，略盡人子之孝。但願他完成了他的心願。

，於連長，願上帝與你同在，舊日列兵現在還在海角天涯，對你祝福和懷念啊！

聖、賢、凡、愚、賤、惡六個等級衡量人羣

人物的特寫到此為止，因為他們只是代表千千萬萬值得大書特書，為國犧牲，具有高尚人格的人。對國家社會，只有付出，沒有取得，儘管其貢獻於國家社會者實際上非常有限，但其在本份上所付出的，可說是全部，這還不够嗎？試看看你周遭的人，問問你自己的良心，對國家社會的取予，又是如何呢？

筆者有一個衡量人生的方式，是以一個人對社會國家的「取」、「予」作基礎，將人們分為六個等級：

- 一、不顧個人享受，一心只圖貢獻社會人羣者為超人或聖人。
- 二、對社會人羣貢獻大於個人享受者為高等人或賢人。
- 三、對社會人羣貢獻等於個人享受者為中等人或凡人。
- 四、對社會人羣貢獻小於個人享受者為下等人或愚人。
- 五、對社會人羣無貢獻而只圖個人享受者為低等人或賤人。
- 六、只圖個人享受而且為害社會人羣者為劣等人或惡人。

基於以上的衡量尺度，我所提出的這些軍中代表人物，在當時是够資格稱得上為「聖人」或「超人」的。當然，一個人在不算太短的生命中，可能在某一階段對社會人羣「予」多「取」少，另一階段則反是

，但綜合起來，仍可以得到一個公正的結論。所謂「取」、「予」，也是依個人環境、地位、年齡而有程度大小分別。但那程度分別，不足以形成各類人物的等級。如一個當總司令或師長的將領，不顧一己享受，一心只圖報國和貢獻社會人羣，按照我的方式衡量是聖人或超人，像我能憶及的張自忠將軍、戴安瀾將軍等之平時生活謹嚴，戰時爲國捐軀者是。但二個士卒，一個伙仗，雖其地位卑微，但如果那士卒伙仗也是只顧國家存亡，只顧同志飯食生活，不顧一己享受，終於爲國捐軀或積勞成疾而死者，其爲聖人的程度或等級的價值觀念，在我的方式內，與總司令、軍師長是沒有分別的。當然，人生幼年、老年依靠父母和社會人羣的供養保護，「取」多於「予」，是理所當然的，不在此例。（註：我這衡量人生的方式，曾於多年前以「享受與貢獻」爲題，作簡單介紹，載於中央日報文藝副刊的方塊上，曾引起讀者良好反應。後選載拙著「自強集」一書。）

統帥檢閱：青年軍訓練的高潮

一、統帥檢閱得觀威儀

不論是戰時的士兵訓練或戰後的軍官教育，青年軍都有令人滿意的表現。因爲，正如本書開始時便提到過，我國社會傳統上是輕視和害怕軍人的，於是身家清白的人，都不願意去當兵，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當兵或從軍在流行的土話中叫做「吃糧」，是沒有受過教育找不到正當職業，又無恆產的

人幹的，所謂「好吃懶做去當兵！」、「去吃糧！」這是多麼不名譽的事和不幸的觀念。然而却風行在我國社會，根深蒂固。這樣，國防還能堅強起來嗎？難怪歷史上外侮頻仍，國恥不絕，造成政治永不安定，經濟永難發展。

筆者後來研讀各國歷史，發現和認定一國之強盛，建基於政治之安定，內憂外患紛至沓來的國家，政治便難於安定。政治不安定，經濟便不可能有發展進步。經濟不能在安定的政治環境和賢能的政府領導之下有計劃的競爭發展，人民生活便不可能改善。結果是天災人禍，鷄犬不寧，不是逃荒討乞，便是逃難搶奪。這是我國和其他許多未開發國家的通常命運和現象。其根本原因發生在人民不願，也無正當途徑可循去替國家社會服「役」，而「兵役」是國家最重要，也是最需要的一種「役」，也就是義務或天職。而社會如此輕視、鄙視，除了走投無路的人，還有誰願意去服那種危險的兵役呢！

青年軍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規模自動自發的從軍運動，從社會的基層發作，風起雲湧，悲憤壯烈。一讀到那號召從軍的悲壯史詩：「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再看到那半壁江山，受敵人鐵蹄踐踏，無辜而善良的同胞，被敵人殘酷的刺刀殺害；敵機轟炸，廬舍為墟。姦淫擄掠，人人自危！有良知的人都不忍袖手旁觀的。所以這次投筆從戎的人，大多是屬於這種良知未泯的人，有大學教授、大學生，有公務人員，有家境優裕的公子哥兒，自然最大部份來自平民羣衆，都是在同仇敵愾的心情下從軍，所以大家的教育程度較傳統抽拉的壯丁爲高。受起訓來，不但在思想觀念上易於溝通統一，戰略戰術

、武器使用上也易於瞭解接受。

當我們入營後，便因日軍侵佔了獨山，威脅貴陽而加緊於二個月內完成士兵戰鬥教育，使盟軍將領如美國魏德邁將軍都讚不絕口。我們當時的訓練方針是「手腦並用，術德兼修」。在當時那種國困民窮的環境下，我們得自己開山闢地修築營房、操場，清潔環境、煮飯洗衣、縫補破爛衣服、編製草鞋。白天最寶貴的時間多是上午上課，下午出操打野外，實在是一種別開生面的團體生活，也證明人類對生活環境和物質享受的程度是可以適應調整的。我個人自認這一年多的軍事訓練，對身心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我後來歷高中、大學、研究院百考不敗，浮沉宦海而表現不凡，馴至於久廢筆硯，輟學十餘年後淬勵奮發，完成博士學位，在彼邦大學執教十餘年而深得學生愛戴，票選我為優秀教授等等，也可說是拜軍事訓練之賜。

我們訓練的最高潮似乎是統帥蔣公的親臨校閱。那時抗戰業已勝利，全國還在狂歡的震撼中，蔣公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三軍統帥的身份，特別於政府還都以前，在日理萬機之餘，分赴各地檢閱青年軍部隊。吾人於全民抗戰勝利，國家國際地位提高，不平等條約廢除，復興在望之時，得親聆統帥訓示，親見領袖威儀，自然是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事。

記得他來貴陽檢閱我二〇五師時，消息雖早已傳出，但上級並沒有宣佈何時要來。而各單位操練之嚴，和各級長官督察之勤，使大家都可想像這一次大概蔣主席真是要來了。我們把最好的皮鞋和服裝留着不用，以待領袖校閱。其誠摯之感情流露，實不亞於子弟之對父兄。但大家又知道領袖於戰後正忙於內政外

交，且還都在卽，深怕屆時因公忙不克蒞臨，那才是失望呢！後來，全師各單位包括六一三、六一四、六一五各團，和炮兵、工兵、通訊、輜重營等直屬部隊，都集中到離貴陽百餘里外的麥家橋營地。直到校閱的前一天，大家還是不知道統帥是否真會光臨。但每一個人企盼的心情都是熱烈的、緊張的，士氣也是高昂的。

筆者個人意外地有幸於校閱前一天便確知統帥業已駕到。那是生平一件難忘的興奮大事，值得一提。記得那天下午，當全師各部隊在閱兵指揮官劉樹勳將軍調督下舉行預校演習完畢，宣佈各同營地晚點休息，準於明晨十時原地集合時，只見一輛小型吉甫車從司令臺急速地朝我連隊伍駛來，一位英俊的年輕少將軍官下車請連長把我找出，謂家叔聖芬先生已隨節抵筑（時家叔任主席侍從秘書），以時間倉促，盼卽赴黔靈山行邸一晤。並代我請假數小時，隨卽登車同往。黔靈山位於貴陽郊外二十里，林木蔥鬱，風景和形勢極佳，到達時已近黃昏，但見車水馬龍，將星雲集，而警衛森嚴。該軍官引我於會客室見到家叔，歡愉興奮之情，不言可喻！我已從農村頑童一變而爲革命軍人。家叔自大學畢業後，卽逢蘆溝橋七七事變，離家報國，萍踪萬里，迄未一返家園，真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其間人事滄桑，不堪回首，尤以祖母仙逝，亦未克奔喪返里。乍見之下，千言萬語真不知從何談起，事實上，時間亦不容許我叔姪促膝長談啊！家叔顯然爲我的年少請纓從事報國而感到驕傲和光榮，談話進行間，他看看手錶說：「你在這裡坐一會兒，我去試一試看主席現在有無空的時間，好讓你去向他致敬。」我聽到這話，心幾乎跳到口邊，經過一陣

緊張後，情緒恢復鎮定，想到我這年輕「列兵」，如真能在這裡單獨謁見「統帥」，不但是個人一己光榮，也實在是軍中的佳話啊！無如待家叔返回會客室時，告以主席猶忙於接見軍政要員未畢，恐難有機會矣！「佳話」頓成泡影。然五年以後，筆者在臺任青年節大會主席時，曾有幸親迎先總統蔣公蒞三軍球場訓話。次年，又以臺大學生代表身份，經教育部考選出席聯合國青年領袖講習會，於出國前意外地蒙蔣公召見，親切垂詢，仁慈有如親長，隨即使我想起黔靈山的往事，和六年來世事的變化，不禁百感交集，不能自己。

第二天上午，豔陽高照，是「天無三日晴」的貴州很難見的好天氣。一萬多名於國家最危難時響應領袖號召從軍報國的青年，在經過一年多嚴格訓練以後，可說是士飽馬騰，軍容壯盛。我們一早便集合在當年憑雙手以圓錐十字鎗開闢的廣大操場上，恭候統帥蒞臨。擴音器播出雄壯的軍樂和凱歌，令人激動。約十時許，只見一長列車輛，由遠而近，我們敬愛的統帥蔣公，在文武百官陪同下，威儀萬千地出現在司令臺上。樂隊奏出崇戎曲，騎着大馬，肅立在場地中央的閱兵指揮官劉樹勛將軍一聲口令，揭開了這歷史性的閱兵序幕。然後他下馬奔向司令臺前報告受校兵種和人數，恭請檢閱。先是統帥乘敞車駛過陳列整齊，頂天立地鋼鐵一般的隊伍，頻頻舉手為禮，不斷頷首稱好。然後分列式進行，士兵一連隊接一連隊地，以虔敬的心情和健美的姿態，正步走過臺前，向統帥致敬，真是氣宇非凡，個個雄赳赳，氣昂昂，象徵着國家和個人的光明遠景，壯觀極了。

檢閱完畢，恭聆訓話，語多昂勉。然後會餐，餐畢復親臨若干桌席視察致意，垂詢生活情形，溫和關切之情，有如家長。臨別之際，猶依依不捨地走向擴音器前，向大家作最後的叮嚀。他說：「親愛的青年遠征軍士兵子弟們：我們今天抗戰已經勝利了，國家名義上也已取得了五強之一的地位。但百廢待舉，而內憂未止，今後建國的工作是很艱難的。我今年已過花甲，最多再能領導你們二十年。希望你們大家都珍惜自己年輕的時光，加強學習，充實技能，鍛鍊體魄，以備將來擔當重大的建國任務……」情意拳拳，令人心折。當時大家的心情是沉重而樂觀的，以為再有二十年的時光在他的領導下從事和平建國，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必可奠定無疑。無如內亂擴大，一般知識份子心存幻想，誤信中共宣傳，使勝利的成果瞬間消失，造成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大的巨變，使大陸十億同胞，三十年來經歷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瘋狂的暴政。實在都是因為沒有遵循蔣公的策略路線，未能團結力行的結果。痛定思痛，豈可一日或忘？好在「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今後如能穩紮穩打，以建設臺灣的經驗和成果，徐徐奉獻大陸同胞，則祖國重光必有日焉！

二、陽明洞受革命洗禮

蔣主席檢閱過後不久，我師奉命組織一個所謂復員幹部訓練班，由每一個連隊考核選薦一名最優秀的兵，去陽明洞研討即將復員的事宜和復員後的聯繫問題，由師長主持。據說這是蔣主席駐節黔靈山時的指示，認為這一批抗戰最危急的時候請纓報國的熱血青年，不應因復員退役而散失，應妥加聯繫照顧，使

成爲建軍建國，改造社會風習的基層幹部。用心是良苦的。一日午餐後，值勤的排長（已忘其名）轉告連長有請，去到連長室，他鄭重地告訴我這回事，說連上經過他、政治指導員和各位排長的推薦投票，選定了我去陽明洞受訓。

陽明洞位於離貴陽百餘里的修文縣。是明朝大儒王陽明（守仁）先生於正德初年開罪權要被朝廷貶謫放逐的地方，古稱龍場驛。據說他那影響深遠的「致良知」哲學便是在這個地方得道的，是所謂姚江學派。「致良知」是以默坐澄心爲主，認爲是非善惡，可於「良心」發作處獲得公正答覆，「良心」有時會爲外來誘惑或壓力所蒙蔽，而令人作出違背良心的事來。違背良心的事有因不自知而犯的錯誤，也有明知故犯的。前者猶可補救，一旦良心發現，便可改正。若明知故犯，則係良心泯滅，罪大惡極，社會國家的力量便必須出而除暴安良，乃有法律的必要。法律所不能及者，則有宗教上的天法神規來勸善止惡。一般宗教上的勸善止惡方式是假藉神力，告訴你害人終必害己，善惡因果相報，天網恢恢，無人能逃得過神的掌心，雖然他可能逃得過國法和社會的制裁。筆者認爲「神」的所在，便是良知。因下賤的人們可以以欺騙、掩飾等方法從事違背良心的事，以逃脫國法和社會的制裁，目的易達，人人有此可能。故西方宗教家乃將此「良心」加以人格化，敬之爲「神」，跳出了個人力量所能掌握的範圍。王陽明認爲人人都有「良心」，只是有時會被「惡心」所蒙蔽。故主張默坐澄心以喚起良心的復活或功能。良心的功能，也都是人一樣，即「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些現象便是。但人類中永遠有

違法亂紀，無惡不作的人。他們違背自己良心，文過飾非，自圓其說，這樣自然可能蒙蔽執法當局或社會大眾，而自以為得。但宗教上的「神」，却是無處不在，你如果信神，便會怕神的威力而不敢抹煞良心文過飾非，自欺欺人。因為神與你同在，且居於你的良心深處。你如果受到魔鬼的誘惑，想做壞事，便是你良心迴圈的烏雲黑暗開始包圍你，使你是非善惡之心喪失，乃為所欲為，雖殺人放火，姦淫偷竊的事都可幹得出來。良心未死的人，會在心萌殺機的時候猛省，而及時改變，所以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諺，亦即良心發現殺生之非是也。基督教重視「禱告」，即是要你與你所信的神交通，因為神無所不在，無力可及，而且就居住在在你的良心深處。祂對你禱告的答覆或指示也是透過你良心的。所以事實上也是在「致良知」，不過因為這個良心已經人格化了，祂高高在上，威力巨大，無遠弗屆，而隨時隨地默默地跟在你的背後；只要你一念信神，便不致於向魔鬼（罪惡）屈服做違背良心的事了。而且當你遭遇到非神論者，或喪失了良心的惡人誤解、詆譏、陷害，甚至喪失生命、事業、財富於惡者之手，即令國法也被蒙蔽，作出不公平的裁判，總總一切，只要你真是一念信神，便不會覺得冤枉，覺得痛苦，患得患失，如喪考妣了。自然更不會尋仇報復，造成冤仇相報的局面。

因為，事實真象，有神知道，神是代表是非善惡的真理，則何須辯解，徒費精神喉舌呢！所以宗教可以彌補國法之不足，收安心定心之效。雖然，皈依宗教的人，也有明知故犯，違背良心和神意的人，但有宗教信念總比無宗教信念好。多多少少總會有些敬神畏神的人，良心未死，不致使社會成為衣冠禽獸的世

界。加以違背良心或神意的行爲，終必受到良心的懲罰，也就是神的懲罰。到頭來都是得不償失的。中國有「三思而行」這句話，便是「致良知」的一種方式，基督教的禱告、佛教的打坐、印度的瑜珈術都與良心有關。所以一個有良心的人，必然是心安理得的人，也必定可以成爲一個好的教徒。

師部決定在陽明洞召訓我們這批「優秀青年」，自然也是希望我們緬懷先哲，面對現實，喚起「良心」，爲戰後多難的祖國奮鬥。對我來說，實在是一件興奮的事。

陽明洞實際上是一個丘陵地帶。位於修文縣城外約十里處，那時已有一條碎石公路從貴陽通到修文，這個由幾個小丘連成的聖地，就在公路旁邊。小丘間已建有幾棟營房，平日好像是由直屬師部的特務連駐紮。真正的「洞」是在一個較大的山丘上，似乎是一個石鐘乳一類的天然岩洞，面積約一個足球場大小，洞外建有古色古香的陽明紀念祠，藏有一些陽明先生的字牒文稿之類。我們來此受訓的人總數才不過百人，時間是兩個星期。師長以下各級重要長官都來講過話。現在回憶起來，只記得許多人都試着講解陽明哲學中的良知良能，把它與戰後國家形勢連在一起，要大家激發起救國愛民的良知良能，正視潛在的內亂危機，保持勝利的成果。這是我戰後第一次聽到八年艱苦抗戰勝利的成果，已有人要破壞奪取。那時正是政治協商會議之前不久，全國都沉醉在虛幻的和平團結氣氛中，卽令在這麼一個極爲機密的訓練場合，教官們都不敢直接指出破壞勝利成果的威脅是來自中共。很少有人直接提「中共」的名而指其非者。大概是遵照政府指示，不要造成破壞和平團結的藉口吧。這也顯示政府在戰後委屈求全的一片苦心 and 誠意，與過去

幾次國共合作的態度是一致的。

訓練期間，我們除了聽到或看到有關戰後如何建設祖國，消除貧窮，躋國家於世界強國之林的言論和資料外，也很少聽到教條式的口號，更沒有人主張要消滅共產黨，置國家於國民黨獨裁之下。相反的，有些教官倒是在忠心誠意地大吹憲政的光輝遠景，認為勝利的來臨，已使孫中山先生所訂的軍政訓政，畢其功於一役。雖然也有一些對中共和國情瞭解較深的人，在談到國家的前途時，流露出無限的隱憂，主要是認定「共產黨」是一種不能容納異己，「唯吾獨尊」到了極點的政治和思想團體，而且也是由一批野心勃勃、不甘屈就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領導。就是執政的國民黨願意與它平分天下，它也是不會滿足的。即令把天下全部給它，恐怕它也不能安安份份地過日子，享太平。因為理論上他們是懷抱着許多不易實現的幻想而缺乏信心的一羣。就是得了天下，幻想不能實現時，它又會找藉口，動刀槍，整得鷄犬不寧。這也就是毛澤東「不斷革命論」的基礎。想不到當時被認為「反動」、「落伍」、「不民主」的這種論調，後來都一一實現，絲毫不差。

其實，那也不是什麼先見之明，或不幸而言中，而是中外政治史上的經驗之談，幾百年前就有人談過。十四、五世紀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前後的許多歐洲學者，便多痛陳「專制」與「暴君」的連環性，而主張所謂開明專制，或君主立憲。到了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洛克、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以及美國佩英、傑佛遜和麥迪遜等人，都認定必須建立一種制度，才可抑制和均衡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力慾望。

和獨佔個性，否則社會國家大事，永不可能有安定和諧之日。因爲人人好權的結果，便是鬭爭不息，政權轉移的形式，永遠止於「改朝換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換湯不換藥」、「一個暴君接替另一暴君」、「一個專制獨裁者，接替另一專制獨裁者」，受罪吃虧的，永遠是被治的平民。因之才有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思想理論發生，才有分權學說和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制度的建立，解決了人類歷史上因政權的爭奪而打破人頭，殺人盈野的問題。中共以殺人盈野的方式取得政權，必以殺人盈野的方式控制和保持其政權，何須置疑和驚異。半世紀來的事實已是足夠的證據了。這是中國人民何等的不幸啊！有良知的人，相信不會以我上面的這些話爲偏見，爲政治宣傳；當我寫出上面的這些話時，我曾經「默坐澄心」地沉思過，那是不是良心話？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良心被權利慾望所蒙蔽的人，則必然要找藉口曲解我說那些話的動機和目的。污蔑我在替某人某黨作宣傳。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

我爲何要做那種勞而無功的事呢？我今天既不爲名，也不爲利，而且謀生國外，舒舒服服，也無需任何名利。況任何名利，也不足以使我個人生活和感受，比現在更輕鬆快活呢！我說那些話，只是聊表一個海外知識分子對國事的關切，敢憑良知說些建設性的話而已。因爲假如我今天還在臺灣擁有一官半職，說那些話，人家必以爲我在討好當權者，想升官發財，我也只能啞子吃黃連，有口難辯。我若是在大陸說那種話，則不是被下放勞改，便是被扣上反動分子之名或以叛國罪而槍斃。所以，我常覺得，海外知識分子受到外國憲法人權條款的保障，有說良心話的權利和自由；若還不敢說，還要違背良心說言不由衷的話，

實在未免有冒作爲知識分子的榮銜了。中國有所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士可殺而不可辱！」以及文天祥正氣歌內所提到的那些爲真理正義而犧牲的先聖昔賢，都是代表着讀書人應有的骨氣，甚至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吳晗，也能說出：「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壯語。他們在專制暴君屠刀之下尙敢憑良知良能說話做事，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人還不敢嗎？

三、立正代替默坐澄心

在陽明洞受訓期間最別致的一件事，似乎是受陽明哲學「默坐澄心」的影響。晨起飯前，不似在部隊時的跑步或爬山一小時，而是由各人於盥洗之後，選擇一個地方去「澄心」，但不是王陽明的「默坐」方式，而是步兵操典上的「立正」方式，故可說是「立正澄心」。時間也是一小時。這可不是一回簡單和容易的事。你要挺胸直背，頂天立地的規矩矩站立在一個地方一小時，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修養的。開頭許多人都感到是一種變相的處罰，雖沒有「兩腿半分彎」或「雙手舉槍原地站」那麼難過，但也不好受。事實上除了雙手不要舉槍外，與「原地站」的處罰是不相上下的。

不過由於與罰站的動機和原因不同，個人的感受亦異。認爲是在受訓、靈修或練功夫。經過幾次磨練後，居然大家都習以爲常了。

每天晨烹初曙，到旭日高昇之時，只見溪畔樹下，巖角籬邊，到處都是肅立有如磐石的青年人，在那裡「立正澄心」地「致良知」。沒有人來檢閱、監督，都是自動自發，自己控制時間，到一個小時完畢，

然後去讀一陣書，或打一陣太極拳，到七點半鐘去飯廳吃早餐。八點開始上課，下午開討論會，各種有關建軍建國、個人前途，和復員後如何聯繫的問題，都是討論的對象。大家都是滿腹經綸，多的是意見。現在回憶起來，雖覺得有些同志仍脫不了「唯吾獨尊」的毛病，發起言來，氣吞河嶽，好像只有青年軍是愛國的，政府應如何如何重用等等。但也覺得是十分可愛的，真有初生之犢不怕虎的氣概。對國家和自己的前途，是那樣地充滿着信心，充滿着主意。

半個月的革命洗禮，時間雖短，確也有許多啓示和鼓舞的作用。大家都懷抱着美好的記憶和憧憬回到原來的部隊，把所謂陽明洞精神——報國的良知良能傳播給同志們，大家興高采烈地回營等待和準備復員之日（六月三日）早些到來。

復學生活兩年，青中教育成功

陽明洞的訓練可說是我青年軍生活的尾聲。緊接着便是填寫復員志願表格等等。軍中充滿着一片勞燕分飛的氣氛，各人各懷大志，政府也特別優待我們，儘量滿足我們的要求，各種志願都予採納，留營、升學、還鄉、入軍事學校深造、去邊疆衛國……等等，不一而足。這恐怕也是國軍史上最民主、最有組織、規模最大的一次解甲復員運動。

我原來是雄心勃勃，志在遠方。想參加邊疆大隊去新疆守土衛國，開創事業，成爲今日的班超、張筵

一方面是自己的志趣，另一方面是我有一個大哥，名霖蘇，軍校十四期畢業，戰時隨十二集團軍在滇西怒江前線服役，轉戰龍陵，畹町，緬北一帶。戰後接收青島，在濰縣受降。應其老長官原十一集團軍總司令，後充新疆警備總司令的宋將軍之召，在新疆輪臺、和闐一帶作國軍的團長。常使我對那遙遠的古西域地方充滿着羅曼蒂克的嚮往。那神秘的天山瀚海，和美目盼兮的維吾爾族姑娘，對一個十七八歲的內陸青年具有無限的神秘感。所以我與幾個志同道合的戰友，都填了去邊疆的志願。無如不到幾個星期，從新疆來的消息是：政局不穩，蘇聯野心復活干涉，國府發展新疆的計劃遭遇挫折，青年軍去邊疆的事也只能作罷。（註：後來又恢復了邊疆大隊，我師有一、二百人參加，包括我的戰友多人。但他們在甘肅蘭州會合了其他各師的志士，要往新疆出發時，也受到阻撓。他們不顧一切地前進，車隊到達甘新邊界的猩猩峽時，竟被叛軍狙擊，狼狽折返。）於是我改填入軍校的志願。

政治指導員田適少校，湖南大學畢業，二十幾歲，一個學者型的愛國者，看到我填的志願表後，找我談話。他先要我說說填寫志願的依據，即為何要入軍校。我當然說了一大套以身許國的大道理，他聽了也很感動，然後他以極誠懇的老大哥語氣向我分析說：「入軍校自然是報國的有效途徑，不過我要提醒你，就我所知道的你的一切，包括個性、體格、能力、興趣等等，我看你並不是一個良好的軍人材料。加以戰後國家將全力從事建設，需要各種人才，你這麼年輕，為何不繼續升學，甚至學一門技術，則將來對國家社會的貢獻恐怕比你當軍人爲大。現在戰爭結束了，現役軍人可能已經太多，裁軍之聲已隱約可聞，

「你不是去趕冷場嗎？……」他這一席話，實在是真摯感人，使我覺得他的分析和看法是正確的，不啻把我從「英雄夢」中喚醒。於是我把志願從「入軍校」改成了「入文學校」升學，目的地是南京的中央工業學校，想學一點工業技術，將來好從事建國工作。

我原來是可以回湖南升學的，何以欲去南京呢？也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想去南京看熱鬧，我知道南京是國家首都，在初中地理書上便知道那龍蟠虎踞的險要形勢，玄武湖、紫金山、秦淮河、燕子磯一類的名勝；明孝陵、中山陵一類的古蹟；加上京畿重地冠蓋雲集，必有可觀。另一個原因自然是因為家叔聖芬先生正服務於最高領袖身邊，常川駐京，也可就近聆訓，獲得啓示。還有一個三兄志淵，也在南京中央日報工作，不時發表一些短文新詩之類，使我非常羨慕嚮往。

快到退伍的時候，中央在國防部成立一個青年軍復員管理局，由蔣經國先生任局長。該局隨即在全國各青年軍所在地成立幾個青年中學，以供退伍士兵中年紀較輕，有志升學的人求學。生活上仍舊繼續施以軍事管理，但教育上則完全照文學校規格，希望培養出一批真正文武雙全的建國幹部。二〇五師所在地的貴州，也奉命在貴陽設立一個。由當時新升師長的劉樹勛將軍為籌備主任委員。

劉師長夫婦對我這小兵真是愛護有加，對我的志氣尤為激賞。當貴陽青年中學的設立計劃確定後，劉夫人黃修祖女士便派副官開車到我連上轉達這個消息，並希望我留貴陽升學。但我還是嚮往南京，到退伍手續都辦好，即將出發前往南京的前幾天，劉氏夫婦特別派車接我到他們的公館盛餐餞別。記得那天還有

二十多位客人，都是跟隨劉師長多年的參謀人員或親戚。其中有一、二員且是貴陽青年中學籌備工作人員，詳細向我說明該校的計劃和遠景，認為將成爲西南最佳中學之一，鼓勵我改變志願，留在貴陽入該校升學。我以一切行程已定，臨時改變，必將增加主辦復員單位的困難。他們告訴我主辦當局早知青年人容易見異思遷，改變主意，已定好了應變手續程序，非常簡單，只須作一報告，經師長或參謀長批准，主辦單位便可照改。這兩位仁兄的遊說，顯然對我發生了影響。當大家酒醉飯飽之後，劉夫人拉了我的手到她的臥室問我，聽到那參謀人員關於青中的談話後，有何反應。她說她十分希望我留在貴陽求學，不但可隨時見面，且可照顧我的成長。她說劉師長和她都對我有很高的期望。情意真摯，有如姑孀。不久，劉師長也進來告訴我，國防部對青年中學很重視，將來師資、設備都不會差。我終於被他們感動，滿口答應。修孀（劉夫人）一聽到我答應留貴陽升學，喜出望外，一時手舞足蹈地奔出臥室，向客人們宣佈這個「好消息」，引起一陣掌聲，真使我受寵若驚。我這時才體會到，由於一年多軍中關係，也可以說是患難關係，加上劉師長與家叔的友情，劉氏夫婦，尤其是劉夫人，對我這「少年志士」已具有深厚的感情，超過他們對一般部下的關切和愛護，令人感激難忘。

幾天之後，我們正式退伍了，成千上百的軍運大卡車，一隊一隊地排列在營地，去長沙的，去桂林的，去武漢的，去南京的，去重慶的，去蘭州的。這些地名牌高高地樹立在車隊的前面，象徵著祖國河山的遼闊，也說明青年軍成員散佈的廣泛。復員的情緒是熱烈的，但「復員不是復原」，也不是「解甲歸田」

，而是奔赴一個新的崗位，在新的崗位去發揮自己報國的良知良能。

留讀貴陽青年中學的約有一千六百餘名，都是年紀較輕的人。由於六月初正是暑假期間，也正值青中籌備期間，當局爲恐我們無所事事，便在貴筑縣麥家橋原來營地，以美軍大帳棚爲宿舍，將小溪修建擴充爲活水的游泳池，僱用了許多貴陽能找到的體育、文康戶外活動專家，辦了一個節目內容十分豐富和够水準的夏令營。我們從單調嚴格的軍隊生活，一變而爲多采多姿的學生生活，大家都覺得輕鬆愉快，好像回到了童年。夏令營中除了上述的康樂活動外，上午還有各科的補習教育和甄選考試，以備吾人秋季入學時，不致有跟不上班的困難。我因從軍前已初中畢業，所以復學時，順理成章地從高中一年級開始。

貴陽青中設在離城十里的南廠兵營，原係該省軍人練兵之地。建築牢固，一棟一棟的兩層方形樓房排列整齊。樓上樓下一邊是寢室，一邊是教室，每棟房子可容納兩個班級，設隊長一人，來自軍中，負管理之責。我們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搬進學校，兩週後便開始了別開生面的學習生活，也可說是允文允武的生活。

我校因係國防部特設，經費較一般中學充裕，教員薪俸也略高，所以吸收了許多優良教師。有三分之一是從貴州大學和貴陽師範學院請來兼課，本地中學的一些有名教師，也幾乎網羅殆盡。

由於學生們都是久經患難的青年，有過求學無門的經驗，一旦復學，大家求知慾都空前高漲，殊非一般中學可比。又因住校生活受軍事管理，除了埋頭用功外，少有外務，也不愁一切，大家學業都進步神速

，委實沒有辜負國家培植之恩。

可惜內戰烽火日益蔓延，眼看着勝利帶來的歡愉興奮之情，漸漸地從大家的心頭上消失，而爲一種消極徬徨的情緒所取代。一片一片的美好河山，文物設施，遭受到中共的瘋狂破壞。戰時多年流離未定的苦難同胞，又要面臨家毀人亡或流離失所的命運。而各級軍政黨務負責人員有的還是醉生夢死，或是得過且過，士氣不振，民心頹廢，恰好爲中共黑暗時代的到臨鋪路。

一九四八年徐蚌會戰失敗，京滬危急，蔣公下野，政府南遷，我校經費斷絕，奉令停辦。我高中才讀兩年，再一次地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

青中兩年的教育對我是有成就的。我從軍前的學術基礎除國文一科因受家庭影響尚不輸人外，其他方面都十分薄弱。加以戰亂流離，和從軍多年的荒廢，復學時可說已不知功課爲何事。但一股強烈求知的慾望，和熱切報國的大志，驅使我孜孜矻矻，勤學不倦。不但很快把「放心」收回，把遺忘了的基本知識重新拾起，而且常常超越教師的要求，不斷尋求課外知識，一天當兩天用，兩年下來，成績斐然。除了課本上的知識一點也不放鬆外，我還特別鞭策自己朝「德」、「智」、「體」、「羣」四育並進的方向奮鬥。我參加有益的課外活動，如演講比賽、作文比賽；我不忽視體育，爲排球校隊選手之一；我爲同學愛戴，經常當選級長和全校學生自治會主席等等。就在我當全校學生會主席的那段時間，好像是一九四七年，全國各大城市學潮洶湧，罷課遊行，反饑餓、反內戰、反美反日，一切都在中共和其同盟

、無黨無派，也就是所謂「黨外人士」，以及一些不滿現實，自命爲前進的大學教授、文人作家、藝術工作者和失意政客們的鼓動操縱之下，把一切因八年抗戰而造成的社會動亂、經濟蕭條的責任推到執政的國民黨頭上，所以，一切的「反」，也就是反國民黨，反政府，反領袖。

年輕無知的中學生、惟恐天下不亂的地痞流氓、一知半解的大學生，在那些人的煽動領導下，真是表演得精采到了極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對政府而言，就像是一棟衰頹的老屋，要被人拆去重建。拆屋的工人羣，從前後左右上下，四面八方加以圍攻，你拉我推，你搥我打。再不倒塌，則安裝炸藥，加以爆破。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就是這樣不明不白，一窩風，一面倒的情勢下被這些人推倒的。

我們這一千多名從青年軍復學的青中學生，就以我爲代表來說，對國家忠心耿耿，早已以身許國，無任何貪婪慾望。既無財產，也無地位，只希望國家強盛，人民安居樂業，使後代讀歷史時，不再是一連串的國恥紀念日。也不必天天被這人煽動，被那黨蠱惑，去打倒這人，去打倒那黨。去街上遊行示威，打警察、喊口號，永無寧日，如此而已。又由於我們從近代史中瞭解到的國家悲劇、革命思想、黨派背景，較一般人深，加上自己實際行動的經驗和見識，始終認爲國民黨的一切比其他黨派止派，當時的領導人物也具有實現總理遺教的誠意。就以我們這些受國民黨政府訓練出來的基層幹部而言，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我們未來的責任是擁護和保衛國民黨的專政，爲蔣主席充當打手，像紅衛兵替毛澤東當打手一樣。即令我們

之中有種自命忠貞，要擁護和驅使國民黨獨裁的人，教官或領導人物總是分析作結論說：「正如國父一再強調，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所趨。三民主義是以『民』爲本，順應世界潮流的民治、民有、民享的主義，國民黨既以實現三民主義爲宗旨，便必須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反之，便沒有僥倖成功的機會。其他各黨派政團的宗旨也必須以民主爲依歸，否則終必歸於失敗。」我曾經不止一次地聽到這種話，不要說國民黨的總理遺教提倡民主，總裁訓示裏也一再地講民主。甚至低層而有見識的幹部也無不以實現民主爲鵠的。

我至今還記得一位在國民黨搞特務起家，能言善說，後來在臺當過立法院院長的劉健羣先生，在貴陽青中演講時，曾與奮地向大家描繪戰後憲政實施，國家走向民主自由的康莊大道的美麗遠景。但他也毫不隱瞞地警告大家，那時還存在着實行民主的大敵和障礙，那便是中共的叛亂。如何加以掃除以實現民主，乃爲當務之急云云。許多思想超越時代的同學，曾認爲他對民主的解釋言不由衷，那也是當時流行的自由式民主思想，既然民主，便不必剿共，而應邀請大家，包括中共，組織聯合政府才對。連美國盟邦也有這種想法。現在事過三十多年，我確有機會博覽羣書，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週遊列國，略識時務；在彼邦大學教政治學又是十五年，回頭看那段祖國歷史，仍然深信爲國家長遠利益計，國民黨當時的政策，以及今日的作法，是沒有什麼大錯的。假如當時真與中共成立了聯合政府，恐怕國民黨早已被分化吞滅，那會有今日臺灣中興的局面？臺灣如不存在，中共更如虎添翼，爲所欲爲，唯吾獨尊，中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都不會比較批評的客觀標準，而一任中共自吹自擂，自欺欺人了。

戰後還有許多事表示國民黨有實現憲政的心向。一是在公共場所，黨旗不再與國旗並列出現。談話中也不再是黨、黨、黨，而是以國家爲重，卽令在其黨內訓練班也是這樣。其次是在中共威脅，社會動亂嚴重的時候，召開國民大會，舉辦選舉，且在國代預留名額歡迎中共參加等等，實在也是仁至義盡了。無如中共的「唯吾獨尊」與「不共戴天」的決心和行爲，較國民黨還大一百倍，終於使內戰無法避免。而執政的國民黨一面要搞民主，一面還要討好巴結盟邦，受其壓力，結果是民主既難實現，獨裁又不徹底，而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我們當時雖然是才不過二十左右的青年，但對政治現實却有相當瞭解。除極少數自命前進的人以外，大多數都是同情政府的，認爲戰後中共如不叛亂，與政府和衷共濟，國家不數年便可強盛復興。所以，當全國學潮澎湃之際，我們獨持異議，呼籲各級學校冷靜，我們要在「安定中求進步！」安定第一，沒有安定，一切計劃都是空談，則進步從何可能？三十多年來海峽兩岸的情形便是鐵的答案。

記得當時貴陽除有幾十所中學外，大學有貴州大學（在花溪）、貴陽師範學院、貴陽醫學院等等。他們自然也是受到北平、京滬一帶學潮的影響，要在貴陽發動。當時貴州省主席楊森將軍、教育廳長傅啓學先生，因讀到我們「在安定中求進」反學潮宣言，不但深爲感動，而且倚爲重鎮。一有貴州大學等發動學潮的情報，便打電話給我們的校長孫樂陶先生，孫校長便派人找我（學生會主席），我隨即召開班代表會議。經過一番討論，分配工作，寫標語的寫標語，招待記者的招待記者，到各校聯絡的去各校聯絡。因爲

大家都是任校，無牽無掛，集合容易，行動迅速，總是在貴州大學的遊行示威還沒有組織成功以前，我先來一個反學潮集會或遊行，聲勢浩大，硬把那些自命前進的份子嚇阻下去。後來我入臺大，正逢傅啓學先生作訓導長，談起這段往事，猶不勝懷念。據他告我，政府撤離大陸前，全國各大城市，除了貴陽以外，沒有一個未曾發生過學潮。

我至今認為我們當時的行爲是正確的，假如全國同胞人同此心，不受所謂前進份子蠱惑，在政府領導下齊心合力，從事建設，憲政必早已實行於全國，經濟建設必已有勝過臺灣的成就。何以言之？在內戰中，雙方所耗去的國家財富及生產能源，何止是經建所需？以此從事建設，不是成就可期嗎？哀哉！中國人民之悲局，何時得了！

再披征袍，情非昔比

人心思變，大禍臨頭；江山變色，神州陸沈

徐蚌會戰失敗，學校奉令解散後，大家都充滿了淒涼消極之感。政府已搖搖欲墜，自顧不暇。真是前途茫茫，不知所從。還鄉嗎？死路一條，必然落入共黨魔掌控制之下，死無葬身之地。找事嗎？走投無路，於是只有打起精神，作再度從軍的打算。

這時，中共已陳兵江北，大有渡江南下之勢，京滬學界、新聞界，甚至商界都不無國民政府大勢已去之感，全國人心惶惶，加上凌厲的中共心戰攻勢，如呼籲「等待解放」、「靠攏」、「不做候補烈士」、「立功免罪」等等花招，確也收到大效。不要說一般頭腦簡單的平民容易入彀，即令有如前說，不滿現實和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人也多認為中共會替他們帶來幸福（許多當時為中共搖旗吶喊的要角，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時都被打成右派，死於非命。文革中倖免於難或文革當權派如四人幫的夥伴，於鄧小平當權後又被打成左派，判處死刑，或下放勞改）。

我校員生自然也反映出這一大環境的縮影，有的同學加入了反政府的組織，行動開始鬼鬼祟祟，朋友間甚至也開始不說實話，躲躲藏藏。政治上的爭辯，更是家常便飯。也有爲了意見不合甚至大打出手的。這真是我國人民的悲劇，我們也難逃其噩運。平日都是天真無邪的同窗好友，一時受到大局影響，竟成了路人、仇敵。當我和幾位友人決定再度從軍後，幾位要等待解放的朋友罵我們愚不可及，說我們是以有用之下去替腐敗的國民黨送終、陪葬。也有人說我們是去「跳火坑」。其中有幾位曾是好友，都是平日品學兼優的同學，一位叫王守直，一位叫譚××（忘其名）都是同班，另有高班的一位叫梁壁，一位叫唐海波，思想都起了變化。當時學校辦壁報之風盛行，每班都有一份，其他學術社團也有，都受到學校鼓勵，並指定在固定地方張貼。每逢月初月中，這些半月一次的壁報都是爭奇鬪豔，多采多姿地出現在壁報欄，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文字水準和內容都很不錯。上面提到的這幾位同學便是校中有名的文豪，由他們主編

的壁報一個叫「燭火」，一個叫「天風」，也是最受人喜愛和重視的。我因也是班上及社團的一員，且常常寫些文章在壁報發表，又好討論問題，所以自然地都成了接近的好友。有時大家辦壁報到深更半夜後，還會到月下去散步聊天，談論國家大事，個人前途。雖然他們早就予我思想前進的印象，但從未發生過衝突或爭辯。因我在全校同學中居於領袖地位，自然也是他們爭取爲友的對象，他們從不支持我的反學潮活動，有時且會冷嘲熱諷。如說我是「忠黨愛國」的優秀青年，他們是百無一用的書呆子等等。當我們班上要爲自己的壁報取個名字時，我提議用「南廠風光」，王、譚二君堅持用「燭火」，並作種種解釋，謂「燭火」是一種希望所寄的東西，我們朝着那燭火的方向張望，便會愈看愈覺其明亮，若再朝那方向追尋，便會走出一條光明的大道。並說「南廠」兵營的境界太小，我們要把眼光看向遠方才是。同學們接受了他的意見，採用「燭火」作爲我班壁報的名字。「天風社」是梁璧、唐海波和周存哲等發起的組織，把我也拉了進去。天風社的壁報一再被老師們評判爲第一名，自然也在同學中建立了權威。但因一次社論批評了那些軍人隊長爲「吃飯點名的奴才」而鬧禍，幾乎被學校封閉，以後道歛了事。梁璧、唐海波常於週末請假出城，說是去看親戚朋友，實係參加校外的政治活動。他們學問文章都十分優秀，常以兄長姿態對我表示關切。不但不支持我「反學潮」的活動，唐海波有一次竟對我表示：「很坦白地說，那是反動。何以言之，全國大學生還比不上你的聰明才智？他們對國事的看法還比不上你的高明？全國大都市都發生了學潮，那是潮流，是時勢所趨。你反其道而行，不是反動是什麼？……」他的話一半認真，一半好像是開玩笑。

笑，但我沒有十分認真地聽。後來，一位天風社社友，與我同是排球校隊一員的周存哲病故，在追悼會上，梁璧、唐海波等悲憤填膺，痛罵政府無能，造成這種動亂的社會，經濟落後，醫藥衛生落後，致使周存哲這麼年輕力壯的有為青年，一病不起。在場的同學們聽到他們煽動性的演講，莫不頻頻領首，淚流滿面，默認周存哲的死，執政的國民黨也要負責。言下之意，別的人執政，周君便可不死。再推而論之，大家如果不願步周君後塵，不想害病早死，便得推翻那「不顧人民死活的國民黨政權，讓愛護人民的政府取而代之……」。他們的語意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身為聽衆的同學們在悲傷的氣氛下，心臟隨着他們的激昂聲調而跳動。我雖然也爲周君的英年早逝而悲慟，但他們那種利用追悼會作政治宣傳的作法很使我不悅，也使我開始疏離他們。

梁兄的反政府態度愈來愈明朗化了。天風壁報上不時出現左派論調或中立色彩的言論。上海觀察雜誌和天津大公報所載名人反對政府的文章如羅隆基、費孝通、馬寅初、朱自清、王芸生他們的文章，也被成篇地剪貼成爲天風半月刊的一個專欄，深爲讀者所喜愛。原來平靜無事，弦歌不絕的南廠校園也開始騷動起來。當我還在搞反學潮活動的時候，居然有人發動所謂「反反學潮運動」的組織，而且有不少同學參加會議，決議要以武力對付我們。青中已不再是昔日的青中了，雖然，它誕生才不過兩年。我與梁璧自周存哲死後便不再親近了。幾個月後，他忽然於一個晚間邀我散步，痛陳國事，馴至淚下，認爲我們當年熱血從軍報國，好不容易獲得勝利，不數年國家糟到如此程度，「國民黨當局之無能、腐敗，引起民憤，是

造成中共的革命原由。今國民黨敗亡的命運已定，咎由自取，理所當然，我們爲自己和國家前途計，實不宜再等待旁觀，應以當時從軍的精神，採取行動，迎接新的局勢。……」他沒有提到中共，也沒有勸我作這作那，但只誠懇地告訴我國民黨大勢已去，不必再愚忠愚孝地去跳火坑了。

梁璧的話是誠懇的，但沒有打動我的心。王守直和譚兄知道我決定再度從軍後，也曾勸我改變主意，我想他們也是看到「燭火」愈來愈近了吧！但因我對中共沒有信心，決不敢冒險圖存。我這種對中共缺乏信心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如下：

一、我出生時家鄉和家庭受到中共農民協會的迫害，餘孽猶存（這在前面已有敘述）。

二、「解放區」傳出清算鬪爭的慘況新聞，較農民協會所爲更形暴虐。

三、我根本上認爲共產黨階級鬪爭的理論違背人性，只可造成一時破壞性的風潮，無救國救民的建設性力量。因人性是自私自利的，需有制度引導其自由競爭，刺激其力爭上游，如此，結果必是優勝劣敗。人人爲免於失敗，便不得不窮其才智努力，以貢獻於社會。

至於因自由競爭造成的貧富不均，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加以均衡調整。如今日美國所行的累進所得稅法、濟貧計劃、社會福利、社會安全制度等等，用不着以流血的階級鬪爭來解決。因爲鬪爭永無寧日，當然更無須以珍貴的自由作代價，換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來防止資本家的肆虐了。所以當時我以一個高中學生的淺薄常識便有那種判斷。經過三十多年以後，獲得了政治學的博士學位，當外交官十餘年，看遍了世

界，又在大學裏教了十餘年的書，依然堅持那種判斷，即共產理論在一個不上軌道、貧富不均、爲富不仁的社會，容易受到貧民的擁護而打倒資本階級。但資本階級打倒後，造成均貧社會，人才斂跡，同時也失去了刺激生產，滿足個人私慾的動力。整個社會便成爲一潭死水。即令當權者不時以這個運動、那個方案去興風作浪，這潭死水也只會發生惡臭，而無補於激濁揚清。從思想方面來說，那便是「黑暗時代的來臨」，是絕不可能長久的。

四、我也不敢信任那些沒有受過正當教育水滸傳式的中共領導人物。

至於我決定去跳火坑，繼續追隨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府的原因，也不是表示我對國民黨的一切都感到滿意。事實上，不滿意的地方很多，除了前面說過許多戰後令人失望的事實外，還有後來發展出來更多令人不滿意的事。如官僚財閥們只顧自己的安全和出路，不顧責任，相率逃亡；甚至方面重臣、大軍將領也是毫無信心，在中共宣傳攻勢之下，靠攏投降。不過我還是對它抱着希望，總覺得國民黨革命救國的歷史和黨格，有着光明磊落的紀錄。其救國的主義——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在理論上是可行的。最高領袖蔣先生的革命志節和人格是可敬佩的。堅信不論是爲國家或個人前途着想，國民黨路線是比較溫和和可親的。認爲國民黨歷史中其所以也有過不够民主自由的階段，主要是因爲存心不良，野心太大的敵人太多，爲了救亡圖存，國民黨乃不得不以牙還牙，以不民主對不民主，以武力對武力。即令如此，它還是不斷地在反省、自責，甚至改造。不若共黨和其領導人執迷不悟，蠻幹到底。到今天全國人心思變，連其本身也已多

方面承認錯誤之後，其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還要強調「四大堅持」。

我一看到「四大堅持」，就爲中國人民悲哀，爲中共悲哀。蓋那黑暗時代，又不知要延長多久？人民生活，又不知將伊於胡底？又不知道反抗的人羣，有多少要身陷囹圄死於非命？又不知道中共政府，爲了堅持實現其永不可能實現的主張，要浪費多少人民血汗換來的金錢？殺多少人？爲了保持其政權，擴充其軍備，多少人民又將被剝奪穿着褲子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爲了防止中共的危害，不但不敢放手讓民主自由充分實行，而且也得花費龐大的軍事預算，以防萬一。我想，假如中國人民是一個有「理智」的民族，中共黨人真是爲國爲民，在經過了半世紀慘痛的內戰、驚人的犧牲浪費，和三十年隔海而治的政、經大實驗，是非已明，善惡已顯，成敗昭著，真理已爲世人所共見時，大家都應該以國家利益、人民福祉爲懷，實在應該弭戰消兵，不作意氣之爭了。只須按照成功一方的藍圖，如法炮製，在同樣的人文社會背景之下，還會有意外發生，使不能成功嗎？讓我們就依照中華民國在臺治績的路線建立一種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吧！

讀者諸君，我們如何才能建立這種制度呢？像美國一樣，政權的轉移，天下爲公，一任民意定之，而非一人或少數人定之。大家一團和氣，快快活活，成者爲王，敗者也無須爲寇。王者竭其才智，盡其領導之責，兼善天下；敗者崇法務實，無愛無慮，獨善其身，安居樂業，何其美哉！爲何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兩敗俱傷，寧爲玉碎呢！

復興關的巡禮

精神堡壘失去光芒

貴陽青年中學奉命結束後，同學們一部份束裝還鄉，一部份自行投奔到部隊裡去，一部份留在貴陽等待「解放」，極少部份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立功靠攏了。但約有五六百人與我一樣，選擇了「跳火坑」，準備作「候補烈士」。這時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弦歌不絕達兩年之久的青中所在地「南廠兵營」，已因大局的劇變和學生的星散而顯得十分淒涼沉悶，內戰的烽火雖然遠遠在天邊，但政局的動亂和思想的混亂已波及全國，小小的校園，不啻就是社會的縮影，前面業已略為提及。

一日午後，軍車鱗鱗，數十輛據說是美軍載馬的十輪大卡車，開進校園，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操場上。震耳欲聾的馬達聲把我從午夢中驚醒，心中立刻激起一陣悲歡交集的矛盾情緒，「悲」在我又要踏上征途，中輟學業（我那時才高中二年級），離別生活多年的貴陽，前路茫茫。「歡」在學校結束以來那不生不死的淒涼生活終於告一段落，又有機會去開創新的機運。而且，儘管這次再度從軍的動機和目的與上次都不同，但在生活遭遇和安排上似乎比上次離家從軍還要有頭緒、有照顧一些。比如，上次從軍是赤腳穿草鞋，在雪地裏步行數百里，到辰溪才搭上木炭車。一路上被日軍銜尾追奔，不時遭遇空襲，那敵機無情的

機關槍子彈，幾次都打在我的身邊，弄得大家滿身塵泥，倖免於難。那時自己才十六七歲，心中充滿了思親懷鄉和熱血報國的激動情緒。這次，動機和目的都不明朗，而且是被動的。不過物質待遇却反而比上次好，足登皮鞋，交通有美式卡車，而目的地是戰時軍政高級人員訓練所在的重慶復興關。就憑「復興關」這三個字，當時已使我感到興奮了。

我們的車隊出了貴陽，浩浩蕩蕩，循西南公路北上，經遵義、綦江等地，直奔重慶——戰時首都和民族復興的聖地。西南公路是有名的險道，全程都是崇山峻嶺，鑿石而成，蜿蜒曲折，懸崖千丈，實非臺灣橫貫公路可比。最著名和危險的工程是七十二拐，係一石山，橫阻去路，鑿隧道既不可能，只得鑿石開路於層崖中，由山南盤旋至山頂，然後再盤旋而下，至對面山北的谷地。一上一下，好像經過兩三小時，但只是過了一山，而且驚險百倍。當車到達川、黔分界的地方時，立刻發現二省天賦之不同。貴州這邊是童山濯濯，飛崖峭壁，草木不生，真是「地無三里平」，加上「天無三日晴」的氣候，自然是「人無三兩銀」了。我在貴州四年所見到的貧窮落後，也實在是令人唏噓。記得在青年軍時，我們的伙食還算不錯（已如前述），每天晚飯過後，常有附近居民前來收取殘湯剩飯，並向我們訴說：「先生，三天不得鹽巴吃啊！」週末外出郊遊時，常見景象之一總是瘦弱老嫗在太陽下幫孫女們捉蝨子，和一些口嚼檳榔，吐黑水的苦力，趕着一羣負重過度的瘦馬，在亂石橫陳的山道上奔馳。但一進入四川境界，便是青山疊疊，阡陌縱橫，頗有江南風味，精神爲之一振。天府之國，名不虛傳。到達復興關時已是黃昏，按照編隊號碼，進駐

一棟一棟的宿舍，又開始了規律的軍事生活。復興關雄踞高山之上，俯見嘉陵江和長江的滙合處，形勢極佳。有名的珊瑚壩飛機場，就在眼底。初來時見到來往客機升降不停，甚覺祖國河山雖然遼闊，如交通工具現代化，亦可朝發夕至，無遠弗屆，則離家千里，與咫尺何異！但國家內亂不停，經濟崩潰，行旅爲艱，家無隔日之糧，人有旦夕禍福，雖在咫尺，亦若天涯，我後來常坐在樹下頑石上觀看飛機在珊瑚壩起落，心中便感慨無已，爲國事悲哀落淚，爲前途沮喪徬徨！

抗戰期間，成千成萬國家社會中堅份子都曾在復興關接受過革命洗禮，完成了抗敵致勝的使命。名之爲復興關，實在是名副其實。現在勝利才不過三年，內戰的烽煙，繼日軍炮火熄滅之後，籠罩了祖國大地，國家復興的美麗遠景，不旋踵即消失於不知不覺中，何其可哀！「關」內建築多已陳舊，油漆剝落，樹木枯萎，似無人管理，精神堡壘上的革命標語和口號，也已褪色失去了光芒，有如大局的令人窒息。置身其間，感覺上已遠非駐紮深山巨谷時期的青年軍可比，那時物質環境還不如現在，可是秣馬厲兵，士氣高昂，人人有爲國犧牲的志節。現在則是領袖下野，羣龍無首，李宗仁妄想以求和換取中共寬恕，徒增其氣焰，瓦解民心士氣，終至不可收拾。

一次革命兩面作戰

來復興關受訓的人，除了貴陽青中的幾百個同學外，還有重慶青中的千餘人。我們從一九四九年三月

到七月初，與其說是在受訓，不如說是在混日子。教官在堂上講反共抗俄的大道理，堂上沒有一個人認真地聽，大家都是懶洋洋地提不起勁來。一些憂國憂時的同學，整天只是高談闊論，不切實際，很像魏晉南北朝時的清談之士，抱着「平時無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心理，然而，我們那時連「君王」都已被迫下野，欲報無從了。倒是那極少數反政府和同情中共的自由份子，隨時隨地散佈流言，興風作浪，製造過幾次風潮。如「要求復興」、「抗議伙食不佳」等等。有的甚至主張拿起槍來開創新的革命路線，喊出所謂「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口號來。意即我們一面要消滅封建反動勢力如官僚資本、地主奸商，一面反對抵抗共黨赤化陰謀。記得一天早報報導與我們命運相同的嘉興青年中學撤消後，也在受訓的學生七八百人，在班主任賈亦斌（也曾是青年軍高級幹部）的率領下，宣佈要「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跑到浙江一個什麼山區去建立游擊基地去了。一個早起的同學宣讀了這項消息，竟在寢室激起一陣歡呼和掌聲，大家都有些羨慕他們的壯舉，可想見我們當時的沉悶，是如何地需要刺激。

「一次革命，兩面作戰」自然也是應付當時局面理論之一，但實行起來頗多困難。蓋二大之間，豈容他人漁獲，更不可能有坐享漁翁之利的機會。而且那時脫離國民黨的領導另走路子，實際上是有利於中共而為他們所鼓勵的。與今日的臺灣獨立運動一樣，只要是分裂國民黨的、反抗國民黨的，中共都可一時容忍，甚至予以鼓勵。因為真正值得他們重視，具有歷史和力量的敵人，只有國民黨，其他力量小，野心大的分歧、騎牆分子，他們從來不會看在眼里，放在心頭，收拾起來，易如反掌也。賈亦斌他們當時所為，

雖也在我們這類青年的心海中激起過微波，但到頭來不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且自誤誤人，誤黨誤國。

復興關當局爲穩定人心，曾邀請一些名流學者、將軍、政要來講演，也發生了些許一時的用，但其曾有一位，因爲太「唯吾獨尊」、「自我中心」了一些，在講話時，既不合邏輯，又不照禮節，官腔十足，陳言高調，對聽衆的情緒和反應也不注意，自以爲是高級將領，一派軍閥作風，濫用權威，幾乎造成不可收拾的尷尬局面，比我前面所述「周排長自討沒趣」的故事還要尷尬。因爲周排長在發現士兵們對他反感和不聽命後，便已開始收斂，沉默肅立，作自反狀，終有連長出來解圍。而這位將軍却在聽衆初步表示出反感後，還大言不慚地叫罵，當時也沒有比他地位更高的長官在場，可以出來圓場，終於造成聽衆與講者激辯對罵的局面，「打倒新軍閥」之聲，響徹全場，他也只好跳上吉普，狼狽而逃。

像這樣缺乏民主風度、自以爲是、目空一切的人當權得勢，真是會禍國殃民的。由這位將軍使我想起了另一位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後來投共被關進牛棚勞改的將軍，他是頗有一點名氣的青年軍二〇四師師長覃翼芝。那是我還在貴陽青年中學求學時，他奉命來視察什麼。當着一千多學生，有一點看不順眼的事，竟在臺上暴跳怒罵，作獅子吼。他也許以爲自己很神氣、了不起，把臺上的校長、主任們嚇得發抖，臺下的我們却把他看的一文不值。原以爲他是軍人中的少壯優秀份子，不無敬慕之心，經過此次表演後，無人再予尊重，因之後來聽說他向中共靠攏，一點也沒有引起我們的奇怪。至於他被中共清算、勞改、關進

牛棚，那更是最恰當不過的了。不過他那次因我們大家還顧全大體，沒有當場反抗，他還是在一羣學校行政人員前呼後擁下，大搖大擺地下了臺。可是中共對他的待遇，却沒有我們對他的優厚了！

分赴前線組訓民衆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們在復興關的訓練告一段落，隨着時局的變化，又經過一次志願調查，留營、還鄉或其他出路，任君選擇。這點，我又要誇讚國民黨作風的民主幾句。即令在那種危急存亡之秋，它還不願意裹脅青年參軍，當炮灰，還容許你自由選擇個人的去路，是十分難得的。這也是我在前文據以評斷國民黨爲比較溫和可親的正派政黨的理由。那就是在環境許可下，它一定會循規蹈矩，尊重人權，實行民主。雖然在被迫太甚，有敵人威脅到它的生存時，它也會狗急跳牆，作出一些不民主的事來。那是中外古今都不可免和不乏先例的。

美國林肯總統是最不民主的總統之一，然而他是以不民主的手段來挽救民主，結果歷史自有公正定評，他一直被認爲是所有總統中最偉大的一位，對挽救美國民主政治制度和國家統一、主權完整，功勳最彪炳。第二位是最專斷獨裁，甚至違背憲法最多的小羅斯福總統。他欲改組最高法院，限制其權力；他不耐美國鋼鐵公司罷工的持久不決，而以行政命令攫取其管理權，勒令停止罷工；他以行政命令把所有日裔美人關進加州集中營；他以私相授受方式把五十艘驅逐艦送給英國海軍而不經國會批准。這些都是不民主、

不合法的，但他的動機，據說都是爲了保衛民主，連聯邦最高法院事後也加以容忍，認爲國難時期，行政元首理應享有緊急應變權，否則國本動搖，萬事皆空。所以史家也把小羅斯福列爲五大總統之一。

當今臺灣大敵當前，風雨飄搖之際，各路欲與國民黨分享政權的「英雄」、「好漢」，不斷以各種名義和方式，搖旗吶喊，你推我拉，很像戰後大陸沉陷前的情形。好像只要國民黨一垮，甜美的政權果實，便會落到他們口裡似的，實在是短視膚淺到了極點。

大陸淪陷前的悲劇記憶猶新，餘痛猶存，塵埃還未落定呢！然而國民黨在應付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所表現出的民主、容忍精神，實在已屬難能可貴，就是得不到「甲」級評分，我認爲至少可以給它一個「乙上」。有時英美民主先進國家還得不到我如此高分呢！試看英國是如何對付愛爾蘭的分離派？美國是如何對付南方分離主義者？美國又如何對付反抗違法的印地安人和「多頭蛇」部隊？不都是用武力剿滅麼？

在復興關這幾個月的生活是十分沉悶的，大局的變化也是空前激烈的，同學中有不少思想起了變化。東南戰局愈來愈悲觀絕望。自蔣公下野後，國軍士氣低落，將領徬徨，不知所從。中共陳兵江北，完全控制着大局。抱着和談幻想的李宗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結果，和談代表有的去而不返，蜩顏靠牆；返回的不是帶來妥協成果，而是哀的美敦書。不滿現實的文化、教育界，推波助瀾的新聞界，幸災樂禍的小黨小派都在隔岸觀火，各懷鬼胎。大家都成了「識時務的俊傑」，投降的投降，靠

撇的靠攏，局部和談的局部和談，連許多必然將被共產黨清算的工商巨子、地主土豪，也存着僥倖心理，認為共產黨也是人組成的，想搖身一變而為共黨術語中的「民族資本家」、「開明地主」，以為那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垂青寬恕。中共也確實善於利用人心，在軍事上正計劃向國軍作致命的打擊時，對上述各階層人士也作出了渾身解數的甜言蜜語，開出永不兌現的支票。一般中下層的羣衆，自然更是像趕搭火車的心情，爭先恐後地去攀援、去靠攏、去立功。「國民黨」三個字，被宣傳得臭到不可再臭，成爲一切罪惡的象徵。

一位英國上議院議員，曾於戰時同情中共，投奔延安替中共効過大勞的林邁可爵士曾著書指出，中共贏得政權，是七分靠宣傳和心戰，三分靠軍事。林氏後來執教華府美利堅大學，筆者在該校進修博士時，曾與之討論，他仍堅持其說。並謂戰後國民政府如不受和談影響，不浪費時日失去戰機，一鼓作氣，直搗延安，則中國戰後歷史發展，可能完全不同。

在志願調查時，約有三分之一的同學選擇了還鄉，三分之一自行組織各奔前程，有的前往廣州，後來隨軍到了臺灣，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包括筆者本人則選擇了留營待命。我們這些留營待命的人，在幾天內便奉命派往沿江各縣去組訓民衆。以二十到三十人爲一組，由川鄂邊區綏靖公署政工處管轄。我們先乘輪船到萬縣向綏署報到，再由綏署分派各縣。記得那是一個仲夏之夜，我們數百同學，在重慶朝天門碼頭登上民生公司的江航火輪，擠得水洩不通，連甲板上都擠滿了人。我和幾位要好的同學，包括前文介紹過的

魯國強——魯寶，只得爬上船頂，作露天過夜的打算。月明星稀，烏雀南飛。我們在船頂上，一面看著滾滾東流的江水，一面看著行將分別的岸上人羣。重慶銀行街昏暗的街燈，把江岸的景物勾畫的輪廓模糊，使人有眼神不清的感覺，到底是景物本身模糊呢？還是眼神不清呢？與我們腦海裡浮現的大局背景，以及此行的前途和發展如何，是同樣的茫茫然難有定見。

江輪於凌晨啓碇，在汽笛狂鳴聲中離別了尚在熟睡中的重慶。順流而下，驚濤拍岸，濁浪排空，只見兩岸小鎮，一個一個地消失在晨熹中，雖然聽不到猿聲，却真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沿途停泊數次，各站都有同學下船。我們於深夜抵達川東重鎮的萬縣，登岸時遇到一陣大雨，大家被淋得像落湯雞似的，在黑暗中找到預定的一個空曠的校舍，既無床舖，又無炊事盥洗設備，當夜便空著肚子睡在地上度過。輾轉饑餓不能成寐之時，我曾想到家鄉和父母親人，以及國家局勢的可悲情況，不禁擁被痛哭，但知識有限，也想不出造成這種局勢的所以然來，自然更沒有救國救民救自己的有效方案出現腦際，只是悲痛填膺，自憐身世，自哀國運而已。

這是我多年未有的一次心態事件，我現在回憶起來，是可以完全理解和同情的。年紀才二十歲的我，爲了抗日離鄉背井，隻身在外流浪業已四載，學業一再中輟，前路事業茫茫，加以當夜在流離中枵腹遇雨，在陌生的環境中睡無床，渴無水，觸景生悲，情不自禁也。

第二天，大家要到山澗處汲水洗臉漱口，比青年軍入營時還要不便，飲食是糙米飯、豆腐蘿蔔，天天

一樣。「待命」了一個星期，終於受到綏署主任孫震上將的檢閱和政工處長湯晶少將的視察，生活隨即得到較好的安排，搬到一棟有生活設備的營房，沒有無人理睬的感覺了。湯晶這個人可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人長得白白胖胖的，五十許，好像有點禿頭。口才特佳，也很懂得青年心理，幾次訓話打氣，把我們個個又帶回到救國救民的心態高潮上。我們被招待與綏署高級長官同樂過幾次，看到政工隊演出的話劇和京戲，水準都很不錯，至今印象猶存。

約兩週後，我們來萬縣的二百多人都有了去處，我的一組十六個人，被派到忠縣。大家興高采烈，好像又走上了救國救民的道路，找到了歸宿似的。

赤子之心贏得友誼

忠縣是依山而建的一個小城，唐代名詩人白居易被貶為忠州刺史，便是這個地方。還保存有他的若干遺跡如樂天亭等，甚具歷史價值，為詩人墨客所嚮往。其鄰縣酆都，以出鬼有名。我們貴陽青中同學有二十五位被派到那裏。還有三、四十名被派到長江南岸的石柱縣，大家都是多年相識，共遇患難，共過筆硯的青年朋友。我們的工作是與縣府合作到各鄉鎮去組訓民衆，抵抗共產主義的入侵。

在忠縣待了約四個月，走遍了崇山峻嶺，領略和印證了小學地理書上介紹的四川，尤其川東三巴地帶所引的詩句「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爬起山來，「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踵。」我們十六個人，

包括魯寶，爲一隊，自稱忠縣民訓督導隊，公推我爲隊長，全隊再分爲三個小組，每組五人，按照日程分赴各鄉鎮，每一鄉鎮約停留一星期。剩下一人留守縣城聯繫，和辦理隊上雜務；縣府並派文書和勤務各一人相助。

這是我第一次正式與家鄉以外的民間接觸，得機進窺我國民間社會組織、風俗習慣、農村經濟結構和危機各端，實爲一次極富啓發性的經驗；有值得深思和研究的價值。

「天府之國」的四川，這時也是民窮財盡到了極點，非親歷其境者，殊難想像。據一些地方上的紳糧和鄉鎮長見告，抗戰以前，四川由一些軍閥統治，每一個軍閥控制某地，便有他的一套稅收田賦釐金制度，不但在其統治當時是巧取豪奪，搜括不遺餘力，還有預徵制度，把未來十年的糧稅也徵收起來，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然而不到十年，這個軍閥被另一個軍閥趕走，新來的軍閥又是如法炮製或另行一套，橫徵暴斂，預徵十年二十年不等。所以中央政府統治權在四川沒有生根以前，四川可說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其實何止是四川，全國不都是一樣嗎？可悲可哀的祖國同胞啊！）抗戰軍興，中央政府力量入川，且以重慶爲戰時首都，自然替四川人民帶來了光榮和希望。但八年抗戰，大部份時間東南富庶之區被敵人佔據，西南被敵人封鎖，只剩下湖南和四川可以出產足夠的糧食養兵抗敵，到最後連湖南也被敵人佔據，只剩下兩個米倉四川了。四川人民的負擔自然很重，戰後元氣未復，內亂又起，只有破壞，沒有建設；只有消費，沒有生產，如何可以不窮呢？

我們在忠縣組訓時，恰值夏秋季節，天氣酷熱，不要說白天豔陽高照，把樹木和莊稼烤得垂頭喪氣，人也喘不過氣來。晚上過了午夜，床上的竹墊和室內的傢具，也還是熱燙燙的。十天半月不下雨，農村原始的灌溉系統失去效用，田裡的莊稼，園裡的菜蔬便會枯死，靠天吃飯的農民便會發生糧食問題。再加上人禍，如土匪的洗劫、官吏的橫徵，或兵燹之災，則更是死路一條。我們當時在忠縣鄉間看到的情形，便幾乎到了上述悲慘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來組訓他們，宣傳共產的可怕如何如何，他們會相信接受嗎？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不難正確地回答這個問題啊！

然而，中國人民竟是如此的純良和服從。儘管他們的遭遇是如此的惡劣，當我們這些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扛着綏署和縣府的招牌來到鄉下要集合他們出操、聽講、打野外、演習時，他們還是規規矩矩地按時前來，而且聽話。使我感到中國人民，包括我自己，真是太容易被統治了。天災人禍，任人宰割，無怨無尤，到死方休，何等可愛的「民性」啊！然而數千年來，統治者不知好自爲之，不建立制度，不作長治久安之計，只顧眼前，不顧長遠；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人民死活，是多麼的對不起人民啊！

反觀別的國家，就以富甲全球的美國來說吧！它的人民可沒有這麼容易被統治呢！不但找不到工作要找政府負責，一點看不順眼，便是請願遊行，政府都有責任滿足他們的要求啊！否則，下一次選舉便請你讓賢了。我國人民（包括筆者本人），在思想觀念上從來不會有過對國家政府的期望和要求，只要不欺我太甚，連反抗的心態都不曾發生過！以這麼優秀純良的人民，和這麼悠久的歷史文化、政治經驗，居然建

立不起一個穩定、可策長治久安的政府，到如今還要以砍殺來解決紛爭，三十年來把國家統治成了地獄，還要汗顏地強握政權不放，嫁禍於人，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可諒解，不可容忍的事。

忠縣的民衆不但沒有因我們的來到而反感厭惡，相反的，由於我們的作風不同於過去的一些官吏，常對我們獎勉有加，臨別依依。譬如，按照舊俗，上頭派來的人，交通上都是不願意走路的，若無舟車之便，便得由地方當局派轎夫抬送，而我們這批青年軍出身的人，畢竟還擁有一點赤子之心，不敢接受這一類違反人權的享受，而寧願赤足草鞋，僕僕風塵地間關跋涉。平日粗茶淡飯，也能甘之如飴。臨去更是乾淨俐落，不敢稍有打擾，更不敢有接受餽贈和盤纏這一類的陋習。有一位知識較高的鄉長，曾真心地向我感嘆說：「督座！（我們當時的官銜是民訓督導員）你們真不愧爲革命的青年啊！政府爲何不早日多起用你們這種人呢！過去上頭派來的人，既不做事，只是擾民，官腔官架十足，來到鄉下，就好像土皇帝一樣，大家惟恐侍候不恭，引起怒罵查辦，大家見了他們都害怕啊！……所以，人民與政府間的關係便也永遠好不起來，還會擁護它去抗拒造反的人嗎？連自己也快要到造反的邊緣了啊！……」我完全相信他的話是出自肺腑的。因爲自己幼年在家鄉，也曾親自看到過那種魚肉人民的不肖官吏，和欺侮平民的散兵游勇。數十年後生活在美國，才真正發現人類的尊嚴，和人民與國家政府的真正關係。一般人民對「總統」也沒有什麼恐懼畏縮的地方，休論其下焉者。雖然，美國的成功，並不是一天一夜的事，而且有其得天獨厚的環境，有以致之。同時，美國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其失敗的一面，我們應如何學取其長，摒棄其短，乃是正

確的態度。

我們去鄉間組訓時，多半住在鄉公所，如鄉公所無宿舍，也曾被邀住在鄉長的私宅。記得一天住在一個鄉公所，夜闌人靜時，烏雲滿天，月光不見踪影，正感到枯燥寂寞欲寬衣就寢時，隱約地聽到一個女人的嗚咽聲，音極哀怨，心有不忍，遂披衣尋聲而去，果見一少女躑躅樹下，在黑暗中啜泣不止，有氣無力。詢其故，謂其新婚夫婦正被關押在鄉公所的禁閉室內，明晨即將被押送充軍。我很難過，請其回家休息，允明日與鄉長一談，看看有無相助的餘地。次日鄉長告以近來羅廣文部隊需補充兵甚急，各縣均有名額攤派，本鄉得五名，年輕人聞訊，都「跳」走了（跳是四川話逃走之意），而軍令如山，鄉兵只好見到一個便抓一個應急。此人新婚燕爾，未及跳走，乃遭此厄運，亦不得已和無可奈何之事。我不以為然，強請釋放另謀公正抽調途徑，鄉長終許之。該青年夫婦跪地申謝，使我不知所措，而感觸特深，情緒激動，多日不能平息。蓋時也，命也，我碰巧得救此人，但不能救所有該救之人。鄉長又何能合理合法去解決此兵源問題啊！

我們在忠縣的任務是無定期的，我們的身份也是不確定的。既非中央正規軍裡部隊的一員，也非省縣政府的一員，也不是民間團體，可說是身份不明的一羣青年。局勢一天天地惡化，綏署也一天天地呈現自顧不暇。野戰部隊這時雖然缺乏兵源，但並不歡迎我們這些「官」。使我們真有前路茫茫和走投無路之感。下鄉組訓的日程告一段落後，我們大家回到忠縣的隊部所在地——一所因戰亂已被解散的女校校舍，終日

無所事事。幾位年紀較長的同學則沉醉於麻將桌上，我和魯寶較年輕而志氣猶存，吃了早飯便跑到附近民衆教育館看報。一切新聞都是令人沮喪的，唯一令我個人感到興奮的事，是偶爾看到家叔聖芬先生追隨在野的先總統蔣公到處巡視，赴韓與李承晚大總統籌商反共同盟等新聞，好像反共的運動還在繼續。其他方面，只是李宗仁的搖擺不定、局部和談、軍隊叛變等令人窒息的消息。偶爾也讀到家兄志淵（時任中央社記者）寫的新聞特寫和文章，散見各報，如讀家書，自我安慰和陶醉一番。

家叔隨節蒞渝，燃起求生奮鬥勇氣

有一天，記得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在民衆教育館所訂的武漢日報上（那時該報已遷萬縣出刊），讀到「蔣總裁蒞渝與軍政首長商議確保西南」的頭條新聞。隨行人員中家叔的名字照例見報，而且他還應記者之間說明蔣公來渝的目的，是以國民黨總裁身份來協助負責同志鞏固西南，並等待李代總統來渝共商國事。蓋李氏那時自知大局不可收拾，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偷偷地逃到香港，以治病爲名，圖潛赴美國，夢想與美國朝野建立特殊關係，也可能是想躲在美國，靜候中共吞沒大陸後，作靠攏求榮的打算。若干年後，李氏的一切夢想不但落了空，而且終於自投羅網，溜回大陸，以爲中共會忘記他過去的罪孽，僥倖圖存，結果被江青一夥人下毒藥把他和他姓郭的妻子一起毒死，也真是投機者的悲慘結局。這一驚人消息，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審訊「四人幫」時才公佈出來。不禁使我爲李氏的晚節不全，未得善終而哀嘆。事

實上，值得哀嘆的人，又何止是李氏夫婦？

家叔隨節蒞渝的消息曾使我心情十分激動，好像是絕望中見到一線希望一樣。忠縣距重慶不過數百里，然咫尺天涯，竟不得一見。好友魯國強知道我有個叔父服務中樞，很不瞭解我爲何不設法求救，脫離此「坐以待斃」的苦海。有人稱尸位素餐的公務員爲「坐以待斃」，我們當時也算是公務員，除有飯吃外，無任何薪資，無「幣」可待，眞是在「待斃」。因爲共黨來了，不被槍「斃」，也會被勞改、洗腦、監禁磨「斃」呢！

魯國強曾不止一次誠心地告訴我：「老曹，假若我是你的話，我一定會去找我的叔父幫忙，去走一條比較光明的道路，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會這樣作，甚至遠親朋友可能爲力者，我也會去找，何況是近親的叔父，而且他似乎也有救你的能力。……曹聖芬先生眞是你的叔父嗎？甬吹牛了，看到姓曹的便亂扯關係，是嗎？……」我家因受儒家思想影響，父子兄弟叔姪之間的關係素極親密，但家教並不鼓勵彼此依賴，尤忌利用親屬的特殊地位去謀己利，有失公平。家叔當時權勢並非顯赫，但地位特殊，爲最高領袖身邊親信的青年才俊。那時才三十多歲，追隨蔣公身邊任侍從機要秘書有年，與美國總統的新聞秘書頗爲相似，名滿天下，交遊廣闊，硬是要找他幫個忙脫離苦海的話，自然可以辦到。雖然他從來不曾主動開口要救我，但我們經常都有書信往來，表示關切，亦談國事。由於魯賢有些懷疑我有攀附之嫌，於是我才從內務箱中取出幾封家叔的來信給他看，他才相信而且十分激動。於是，以諸葛孔明的姿態向我分析大局，和各人的

處境，嚴厲地要我立即採取行動打破這個「坐以待斃」、不生不死的沉悶局面。

於是我立刻寫了一封信給家叔，寄到重慶的林園官邸，報告我們的處境和川東局勢的嚴重，並表示希望打破沉悶局面。報紙上繼續報導大局惡化的消息，最令人驚惶的事是蔣公坐鎮陪都時，重慶居然發生大火，據說接近朝天門的那條銀行街被燒成一片瓦礫。報上還有家叔在記者會中呼籲團結，提高警覺的新聞。就在這兵荒馬亂，軍書傍午的匆忙時期，不到幾天，我居然接到家叔的回信，囑善自珍攝，沉着應變。「如有自己不能解決的問題時，可去南川依汝長兄，萬不得已時，也可持函去見孫總司令德操（震），請示去處……」，並附一函致綏靖公署主任孫總司令，並沒有要我去重慶，或提出其他具體指示，可見那時他們也是行踪不定，忙碌不堪。

我接到這信自然極端興奮，連忙拿去與魯寶商談。魯寶問我長兄是幹什麼的，我說他是軍校畢業，現在宋希濂的十四兵團當教導總隊長，訓練幹部，相當於一個旅長，目前正轉戰川湘鄂邊區。他說，南川離此數百里，與重慶距離差不多，與其去情況不明的南川前線，何如去重慶作根本之圖。何況你大哥的處境也很危殆，恐怕自身難保，於是魯寶促我去見孫將軍請示。想不到搭輪去萬縣，孫氏的參謀人員告我，孫氏奉召赴渝，下週始歸。我下週再去見到孫氏時，家叔又已隨節他往了。不過孫氏表示局勢在一二年內不致有何劇變，且綏署正準備「把你們編入正規軍……」，臨行並告在渝見到家叔，請我個人如有問題或計劃，不妨隨時提出，並交代一位參謀人員把我的姓名地址留下，囑隨時聯繫。此行除得到一個消息「綏署

正考慮把你們編入正規軍」外，對個人脫離苦海的事並無進展，因我事先既不願向家叔表示有意離開崗位（雖然事實上並無崗位），事後更不願向孫氏提出，蓋恐有違軍人本色也。何況我也知道家叔和孫氏他們也都是公務倥傯，各忙各的，沒有閒暇爲我的事作特別安排。回到忠縣，無所事事，一拖又是二個月，「編入正規軍」的事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正如我前文早已提到，各野戰部隊都是要「兵」不要「官」，加上我們這些半吊子，既非軍校畢業，又非各兵團教導總隊或軍官訓練班畢業，在門戶觀念仍舊很深的當時，是沒有部隊歡迎我們的。也許綏署的計劃落實不了，便是這個原因。

亂世友情深似海，衷心藏之永難忘

到了十一月中旬（一九四九年），川東情勢惡化，防守川鄂邊區的羅廣文部隊，及防守湘鄂邊區的宋希濂部隊都被襲擊，潰不成軍。這些福將，平日看起來威儀萬千，一表人材，想不到臨陣不堪一擊，使統帥部保衛西南的整個作戰計劃都爲之失效，而不得不將保衛西北多年的胡宗南將軍部隊抽調南下，加強成渝盆地的防務。蔣公坐鎮重慶至最後一天，據說就是在等待胡軍，希望以川西爲據點，遏阻共軍撲向雲貴高原，使國軍得機喘息，負隅再戰，徐圖匡復。無如蜀道之難，有如前述，再以交通工具缺乏，部隊運行，多靠雙腳和有限的騾馬汽車。當胡軍抵達重慶外圍時，已疲憊不堪，而共軍挾戰勝的餘威，和有利的民氣，乃得勢如破竹，輕取西南要地。蔣公以在野之身，負起收拾李宗仁丟下的殘局，於重慶失陷之日才轉

赴成都，驚險百倍。（關於這段史實，家叔有「從溪口到成都」一文行世。）

從十一月中到十一月底，這一急轉直下的局勢，筆者身歷其境，目及「兵敗如山倒」的悲劇，感慨特深。而個人以一高中二年級的散兵游勇能僥倖逃脫厄運，來臺復學，得有爾後之發展，尤屬奇蹟，不得不爲之記，以誌不忘，亦足以反映當時時局之一斑。

緣自八月家叔隨節蒞渝，魯寶促我求救不果後，我原已放棄離川赴臺幻想，而與各同志計劃自謀生路，即如果編入正規軍的綏署計劃不能落實，我們將向綏署請願每人發給武器槍枝，與沿江各縣民訓單位的昔日同學聯絡，組織游擊隊，朝川西和雲貴高原方向戰鬪，如該等地區不保，則向滇緬邊區打出路。我們甚至已開會討論多次，在地圖上劃好路線，萬事皆備，只欠東風（武器）了。這時因計劃已定，心情倒反而鎮定，大家都快快活活地等待槍枝，採取行動。但日復一日，不但槍枝沒有消息，連吃飯的補給都不能按時獲得了。前時時發生這種情形，還可向縣政府商借週轉，現在縣府也決定疏散他遷，共軍已佔據了南岸的石碓縣，萬縣都受到威脅，綏署總司令部也在遷移了。

就在這時，讀舊報知道蔣公於十一月中再度來渝坐鎮，魯國強（魯寶）以極爲冷靜無私的態度警告我說：「老曹！現在事已至此，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我們既無人管，又手無寸鐵自衛，恐怕只有坐以待斃的一條路。任何人如能自謀生路而不爲，那是愚笨。我們同生死、共患難這麼多年，自然希望同在一處，彼此照顧。但現在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你如能去重慶找到你叔父隨去臺灣，那是一條光明大道，將來有

朝一日，政府重光大陸，我若沒有被殺，還可有一個朋友來救我，照顧我，我們何必要大家在一起坐以待斃呢？打游擊的計劃，恐怕也實現不了啊！趕快動身去重慶吧！……」我非常感動，也想趕快動身。但因一年來既無正薪，又無津貼，平日綏署所發的一點象徵性的零用錢，早已花光，如何動身呢？靠討米是到不了重慶的。但我知道大家都沒有錢，也從未向魯君提及。一天下午，記得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偕魯國強爲隊員生活問題去縣府商借柴米油鹽的事，見到平日負責與我們聯繫的蒲主任秘書，他告訴我們問題嚴重，忠縣與川東各縣的電話都已不通了，縣府已奉令疏散他遷，縣長都已棄職逃回成都家鄉去了。蒲氏奉命暫代縣長，局勢再惡化時，也準備隨時動身沿江西遷。我們聽得心慌極了。借糧之事，倒是圓滿完成，因縣府存有餘糧萬噸，正無人管理，「請你們自己去倉庫搬運好了，要多少，便搬多少。我現在簽發你們一張手令，暫寫白米一千斤如何……」臨行時蒲秘書也誠懇地警告我們，如有路子可走，走爲上策。這句話激起了魯寶對我的關切，他告訴蒲秘書我們隊上的十六個人，除了曹隊長有個叔父在重慶外，其他人都是家在湖南、湖北一帶，那邊也很亂，回去恐怕也是死路一條，只有坐以待斃了。」

蒲秘書連忙問：「曹隊長你叔父在重慶做什麼事？……」我還沒有回答，魯寶說：「是蔣總裁的侍從機要秘書！」蒲氏不待魯寶把名字說出，便接着說：「是曹秘書曹聖芬嗎？」我說「是！」蒲氏說：「我的小老弟！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有這種關係，居然還困守危城坐以待斃，到這種地步，也不想辦法求生……」

蒲氏年約五十許，四川南充人，久歷戎行，見識廣泛，頗善交際，我等到忠縣後，縣長指定他負責與我們聯繫，爲人和善，有求必應，成爲忘年之交。他並告訴我近日還會有汽船自萬縣撤退軍眷西行，可注意趕搭，同時也告我蔣公還在重慶，李代總統已出國，他判斷蔣公會坐鎮到最後關頭，十天半月不會離開。「你如能搭上一條輪船，一天便可到重慶，見到你叔父，他不會見死不救的！他會有辦法救你的，我保險……」但他們不知道我是「啞子吃黃連」，身無分文，有苦難言。就在我聽完蒲秘書的話，要握手告別時，我說：「搭輪船不知船票要多少錢？……」這一提，使敏感的魯寶馬上知道我的問題所在了。未待蒲秘書解答我的問題，連忙說：「我多年積蓄，曾在貴陽買了一個小金戒指，可以折半給你兌換，或可得二元銀洋，想必够用了！……」蒲氏搶着說：「三元可能不够，起碼得有五六個銀洋才够，何況現在銀樓已關閉，市面已疏散，你那戒指恐怕要到鄆都或重慶才可兌換。老弟，幾個月來，我們也算成了共患難的朋友，我還有一些銀洋在身邊，我是四川人，去南充老家的路費也不需太多，你若不嫌棄我這老朋友的好意，我借你三元，到鄆都的路費够了，再兌換他那戒指，不是解決了問題嗎？」蒲氏跑回他的辦公室，也是臥室，帶着二隻銀洋，塞進我的口袋，推着我走，並囑注意過往輪船。再三叮嚀：「老弟！機會不多了！」

這種亂世友情，是純真無私的，我委實想不出任何語言來描寫心中的感動。「衷心藏之，何日忘之！」就這樣，我決心一試。次日，早餐時，聽到輪船的汽笛聲，好像在向我呼喚，魯寶隨即催我行動。我

放下飯碗，提着簡單的行李，由勤務小楊和魯寶陪同，拔腿便跑。忠縣是依山傍水而建的山城或坡城，我們駐地在高坡上，俯瞰長江，風景不凡，白居易被貶爲忠州刺史時，就住在離我們不遠的「樂天亭」現址，寫過許多流傳千古的史詩。當我們狂奔下山，抵達江邊碼頭時，但見滿船武裝部隊，是向東開赴前線的。另有軍眷難民上千，老弱婦孺，神色倉皇，麇集岸上，都是在等候西行船隻撤退的。據軍眷領頭的人稱：「這條船去萬縣把軍隊卸下後，下午便會回來接我們……」我問：「你們爲什麼這樣早便在這裏等候呢？」「船是沒有定時的，上船也不對票，誰搶上船，誰便先走……」這對我已不是新聞，因爲抗戰末期，當日本侵略軍每到一地，難民軍眷逃亡的情形，也是這樣。我不但曾看到過輪船、汽車、火車的頂上、階梯上都爬滿了難民，而且看到過婦孺被踐踏、從車上跌下，或墜入水中的悲劇。我得到這個消息後，心中有數，我是一個青年光桿，搶上船的機會自然較多。但願所有的人，都能獲得機會，尤念多年戰友，一旦離別，不知命運如何。心中一則以喜，一則是十分難過的。

我們敗興而還，一心一意注意下午西行的船隻。正是吃晚飯的時刻，果然又聽到汽笛聲。再去江邊，見到早上的那條船，滿載從萬縣撤來的軍眷，拋錨江心，許多人要在忠縣下船，可能是還鄉的。成百的小木船，蜂擁船邊，有的是接人下船，有的是送人上船，亂哄哄的。漿聲、馬達聲、號哭聲，響成一片，使我想起了日本飛機第一次轟炸家鄉益陽時的情況。我便是在這股亂流中，隨着人潮擠上了船，不到幾分鐘，輪船的馬達加足力量，汽笛狂鳴，鼓浪西行。從船邊遙望岸上，見魯寶和曾替我和隊上同志忠勤服務達四

個月的小楊，還在注視着輪船奔逝。但他們一定沒有看到我熱淚滂沱，在江風拂面中，心如刀割。親愛的魯寶，謝謝你的鼓勵和資助，使我走上了再生的光明大道，你後來是否度過了危難？充軍了？還鄉了？！上學了？現在是否還在人間？三十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和祝福你們啊！

此去無人知險吉，煙波江上使人愁

我們的船於天黑時刻到達鄞縣鄞都而止。因為該船當晚還要從鄞都運兵去萬縣增防。我有廿五位青中同學在鄞都組訓民衆，他們的遭遇與我相同。我找到他們的駐地，一見如故。因為在青中時我曾是全校學生會的主席，後來又同去復興關，大家都認識友好。他們也正爲大局發愁，徬徨不知所措，見我來到，激起一片歡欣，以爲我可以替他們帶來主意和領導。我把我們在忠縣原議的游擊計劃告訴他們，希望他們趁早獲得自衛武器，否則一切皆空，他們深以爲然。我又告訴他們我個人赴渝計劃，但謂如不能如願，當參加他們集體行動。

「最難風雨故人來！」他們買了許多隻鷄，自殺自烹，替我洗塵。我一面吃着，一面想起從軍前當年日寇侵逼家鄉的時候，家中老弱婦孺都去山村避難去了，只剩下我和幾個年輕兄叔和傭人留守老家，那時家中養了許多鷄，我們惟恐日本人來了會吃掉我們的鷄（事實上何止是吃鷄，一切都完了），便天天殺鷄吃。太平盛世，只有逢年過節，戚友來家，才以鷄黍招待，鷄的滋味便也特別鮮美。但天天吃的結果，到

後來竟感索然寡味，如同嚼蠟。馴至多年後聞到鷄味，心中便欲嘔吐！現在同志們於患難中以鷄待我，雖未嘔吐，但「生不逢辰」、「命途多舛」之感，油然而生，與前次正同。只是前次的厄運是由外患造成，這次爲內亂的後果。對於我們這些正在成長，需要教育的青年來說，是多麼殘酷啊！

一面吃喝，一面回憶，不知不覺已是午夜時光。隊長王衛民兄告訴我，他自然也希望我留下與他們共患難，但正如魯國強兄的無私友愛，認爲我如能去重慶轉赴臺灣復國基地，自爲上策，「坐以待斃，同歸於盡，非兵家深謀遠慮之道也！」他並告我，鄧都去重慶原有定期民航，每週三次。但從川東局勢惡化以來，輪船忙於軍運，民航業已停止。不過運兵船回航時，多載軍眷西行，「兄或有機會擠上！」這自然與我在忠縣時的情景相似，只有等待觀望，聽天由命了。

度日如年地一天換過一天，川東局勢並沒有因部隊的增援而穩定。相反的，失敗的消息頻頻傳來。在我到鄧都後的第二個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忽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大家驚惶萬分，以爲發生了情況，莫非共軍進城了不成。大家都起床想從後門逃走時，發現原來是從南岸撤退過來的青中同學數人，告以石碓縣已完全淪陷，許多同鄉都已被俘，隊長歐陽天杭抗拒受傷。共軍正疾速西進，我軍簡直已無鬪志，大部份是被共方「局部和談」詭計先瓦解了軍心，然後解除武裝的。據他們親自經歷所知，共軍在還沒有發動攻勢前，不是利用國軍的俘虜打前站、喊話，央求國軍停止射擊，不要殺害自己同胞，或潛入司令部要求「免戰」；便是由共軍指戰員利用通訊網（電話）向我方部隊長提出就地停戰條件，進行「局部和談」

，以各種甜言蜜語英雄頭銜，誘惑我部隊長下令停止射擊，終於上當，俯首就擒。

由於統帥蔣公下野後，李宗仁幻想和談所造成的曖昧和緩靖空氣，使政府剿共立場變得模糊。上行下效，上面求和，且不得要領，現在我們下面倒是由共方先提出和談，不是正符合上面的政策嗎？許多頭腦簡單，或存心投降的部隊長便這樣一個一個地俯首就擒，還以為是符合政府免戰求和的政策，替國家作了貢獻。至於以後的遭遇，在中共統治之下，是不難想像的。段克文曾寫過一本「戰犯自述」說得很多，似乎是可信的。至於多年後李宗仁夫婦被中共毒斃，更是經過中共官方承認的。

南岸撤退同學的親身報導使我們這二十幾個有如「喪家之犬」，「坐以待斃」的青年人更加茫然沮喪，面對如此局勢，竟一籌莫展。魯寶的臨別贈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時在耳邊響起，然而日復一日，不見輪船的影子，也不聞汽笛呼聲，真是望江興嘆，招來滿腔惆悵。

就在十一月廿四日，我吃完早餐後，從住處的樓上看到一艘龐大的江輪，滿載軍眷和難民，冒着濃煙，自東而來。我心想：莫非皇天不負苦心人，最後逃生的機會來了。提着一箱一袋，由王衛民兄陪着，直奔碼頭。江邊亂況，較忠縣有過之而無不及。上千的軍眷和難民在等待撤退，一見船到，便不由分說地擠上待發的駁船，或自僱小划子向停在江心的輪船闖去。由於秩序太亂，船上本來有許多人要在鄂都下船也無法下來，站在船頂押船的槍兵們看到情況失去控制，便發射輕機槍鎮壓，並吆喝上船的人且慢。機槍子彈打得水花四濺，自然發生了鎮壓的作用，許多像蜜蜂一樣原已接近輪船的划子聽到槍聲都開始散開。

這時，輪船汽笛狂鳴，馬達怒吼，竟不待船上的人下來，便鼓浪西進，逃之夭夭了。王隊長衛民兄安慰着我，幫我提着那不值錢的簡單行李，回到宿舍。然後以電話約請當地幾個朋友，也是平日與他組訓民衆業務有關的地方長官和我，一道到他常去的一個尚未關門疏散的餐館吃午飯。王兄顯然感到我去重慶的機會已不太多，有意介紹我與他相好的幾條地頭蛇認識，交換情報，並繼續他們早已開始討論的應變計劃。沒想到兵荒馬亂的時候，我還有機會吃到這麼一頓生命中難忘的美味午宴，不但菜好酒香，參加的客人也是個個健談，而且口才常識都不錯。

關於四川人的口才一點，我要在這裏帶上一筆，就是我自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到重慶以來，便發現所有我見到的四川人似乎都是能言善說，雖販夫走卒亦然。我後來發現這似乎與四川的一種社會風俗有關，那便是泡茶館和擺龍門陣，二者是連帶的。四川茶館之多，喝茶風氣之盛，到過四川的人都難以忘記。公餘週末，黃昏飯後，男士們都邀約幾個朋友去茶樓一坐，一碟瓜子花生，一杯清茶，便開始擺起龍門陣，一擺便是幾個小時。尤其是夏日炎熱的氣候，戶內有如蒸籠，人們多在露天茶館坐到深更半夜還不回家。茶樓裏也不重視公共規律，瓜子花生殼直接拋到地上，夜可盈寸。言談笑唱之聲嘈雜不堪，誰也不干涉誰，誰也管不了誰，談話內容與談話的聲調一樣複雜，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夫妻吵架，無話不談。可說一點情調也沒有，也可說那便是情調。事實上我不但習慣那種情調，而且常常懷念那種情調，多麼自然，多麼開懷。我到現在談話的聲調還是很高，就是在四川這幾個月培養出來的。我想，四川人何以人人能言善

說，也是從龍門陣裏擺出來的吧！

那天吃飯的人連我和王隊長一共六人。那道地川味的豆瓣魚、麻辣子雞、魚香肉絲、豆花等等，鮮美到三十年後的今天回味起來，仍不免要嚙口水。但那火辣的程度，連我這來自辣鄉湖南的人也爲之涕淚交流，看起來好像是在爲大局哭泣一般。吃喝間，只聽到王君與他們稱兄道弟，許多措詞，都不是日用語言，起初忙於杯箸，我也無意瞭解他們所談。後來傾耳細聽，始知他們在以「袍哥」術語交談。

「袍哥」是我國民間幫會組織的一種，在四川甚爲普遍。參加的人要拜把宣誓，歃血爲盟，大家以道義氣節相勉，生死以之。同仁按年資有長幼大小之分，層層節制，紀律嚴明。這種民間組織，在西方社會也很盛行。如前面提到的美國「後臺老闆」(Boss)或「滅非」制(Mafia)等等，也是以某人或某團體爲中心，結成盟會，在社會上爭取領導或控制權，凡與之不友善者，必去之而後快。其組織龐大，經費充裕者，馴至控制選舉，左右政府政策，如有名的紐約譚曼尼社(Tammany Hall)、前芝加哥市長兌里等等。正如任何一種組織，「袍哥」也會牽涉到「權」「利」問題。而且也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艾克敦(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化！」「袍哥」們在地方上建立了羣衆基礎，獲得控制權後，不要說在社會上會橫行霸道，唯吾獨尊，目空一切，連國家主權，政府威信都不免受他們的擺佈。如美國的譚曼尼社和兌里市長，中國上海的杜月笙、王曉籟一樣。據說四川社會上的小杜月笙幾乎充塞各階層，我在忠縣便已聽到。前面提到的蒲主任秘書據說便是袍哥中的頭頭。他立即給我三隻

銀洋作路費的明快作風，也是標準仗義輕財的袍哥作風。

由於王隊長衛民兄與他們以袍哥術語交談，我暗中揣測，王君這幾個月來，很可能已加入了他們的組織。王君雖然與我同是從青年軍退役後入貴陽青中，然後赴復興關受訓，再被分發到鄂都來組訓民衆，但年紀起碼較我大了四、五歲。對社會情況，尤其是當前危機的認識，自然較我們爲深。他們的談話，據我一知半解，似乎與局勢的可能發展和應變計劃有關。從他們飲酒談笑的表情上，我看他們很可能沒有認識到局勢的嚴重和共黨的可怕。他們也許以爲這次變化，與歷史上改朝換代一般，換一個皇帝便沒有事了。他們照常可以控制着社會的基層，我行我素，新政府也必然要爭取他們的合作。這種想法，在當時社會各階層似乎都很普遍，是一種「想當然耳」和「僥倖」心態的混合物。殊不知共產革命是狂風暴雨式的階級鬭爭，它要徹底把舊社會的一切濂除，建立一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還會容許這種封建社會的幫會組織存在嗎？王兄在個人和團體的前途茫茫時，想獲得當地袍哥們的保護應變，用心是良苦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其結果如何，便難揣測了。

就在大家吃喝得起勁，話題轉到難民軍眷的撤退和我去重慶的可能時，一位醉醺醺的食伴却提供了我一個逃生的新消息，也是決定性的消息。他說：「剛才我沿江邊大路來餐館途中，在距此地約把里（十里之謂）的地方，看到一艘大輪船停在江中卸難民……船頭向西，不知是不是去重慶的。……」我一聽便知那一定就是上午我去趕搭未成的船，它大概是爲了躲避鄂都碼頭太多的人羣而改停在郊外卸人的。餐會

既近尾聲，我便向王君請求早退，前往一觀究竟。於是疾返住處，拎着包袱，拔腿便跑，沿江路西奔。恐怕至少跑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輪船所在的江岸。筋疲力竭，上氣不接下氣的我，又想起了從軍前在家鄉風聞日軍在家鄉千家洲登陸時我狂奔逃命的一幕，跑了十餘里之後，兩腿不支而摔倒的絕望之痛。這次雖沒有日軍追趕，但其爲逃命則一。

先我而到的難民羣又把江岸擠得水洩不通，而且船上的人下來後，過去幾小時內上船的人又把船艙、船頂，甚至登梯上都爬滿了，還有成百的人急向押船的官兵求恩圖爬上船去，我在岸邊竟找不到划子或駁船載我上船，望着升火待發的輪船欲哭無淚。這時已近黃昏，夕陽照耀着滾滾江流，兩岸景色如畫，天邊散佈着彩霞，好像是紫水晶、紅瑪瑙和翠玉一般，滿天都是，使我想起在忠縣樂天祠中讀到的一首白居易（樂天）的詩：「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誰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這首詩可能是白先生被貶忠州時看到江色而寫的，前面兩句把我當時所看到的景色活生生地描畫出來，但我當時的心煩亂，也沒有閒情來欣賞那詩情畫意了。

船已暴滿，靠近輪船的許多滿載難民軍眷的划子，還在如蒼蠅叮臭肉似的不離去，又惹起槍兵的嗚槍吆喝，才紛紛靠岸，使輪船安全移動，揚長而去。我在江岸人羣中，顯示出無限沮喪失望之情，忽然一個船伕走過來搭訕說：「長官！你要不要去涪陵？我可以送你去！……」一詢究竟，才知該船夫是從涪陵被軍方拉差來的。現在沿江軍運倥傯，若以空船回去，中途必被再拉當差無疑。他躲在這個城郊樹叢小肆業

已兩天。願載我去涪陵，因我着軍裝，有軍人身份，沿途軍人，當不致再強迫東下了。他說船費可免，但請供應船伙二人沿途伙食便可。

寒天冷月孤舟客，不聽猿聲亦斷腸

就在船伙與我交涉的時候，一個年輕軍官聞聲而至，他也是想搭船西行去涪陵附近還鄉的。有了旅伴，膽量也大了起來。坦白地說，原來我還有些擔心那船伙對我不懷好意，因為江上謀財害命的事也常發生，我形單影隻，身懷銀洋三隻，金指環半個（蒲秘書和魯寶所贈，還沒有動用），手無寸鐵，一人上船，說不定船到無人之境，他們將我殺了，投屍江心，真是神不知、鬼不問。我這當年雄心勃勃的少年志士，不死於抗日，不死於剿匪，却成了長江的魚食，那才不值得呢！我當時面對着那兩個粗壯的船伙，看到夕陽西下後的長江，像烏龍一樣的婉曲奔騰，咆哮東去。想著不到幾天，它便可看到烽火連天的襄（陽）樊（城）和正被戰火燒灼的江南京滬，引起我唏噓浩嘆不止。又想到從軍離鄉以前，住在邀我一道從軍，後來中途開了小差的陳光祖君家中，他以拂逆家人阻其從軍好意，他盛怒中的姊姊脫口而出咒罵道：「你們都是不聽忠言的小子，將來會死於非命，死無葬身之地的……」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但看到那比我年紀大的年輕軍官也要搭船，這種無名的恐懼感便完全消失了。

我們隨即登船出發，二人各出銀元一枚給船伙在岸上小店買些柴米油鹽，以供路上共食。船是一艘普

通划子，長二、三丈，寬五、六呎，是涪陵所在的烏江小船，並非航行長江用的。除了尾部舵手處有竹樞和棕葉編成的臥篷稱爲「鵝窩」外，別無遮蓋。船伏二人，一前一後，溯江而上，蝸步前進。多半時間是在兩岸迴流中航。一路上頗有「江邛嗔色漸淒迷，數點寒鴉雜雁飛」的景象。第一天走了約三十里，停在江邊一座古木參天的古廟下，月黑風寒，廟裏的孤燈半明半暗，我很想捕捉一些「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的詩情畫意而不可得。

四個人擠在狹小的「鵝窩」裏過夜，倒不覺冷，但拂曉前下起雨來，却把被褥浸濕不能續眠，實在是十分痛苦的事。「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似乎可以描寫當時的情景。兩個船伏雖然是三十餘歲的壯年人，但都染有芙蓉癬，就在我不能續眠而睜視着江潮泛濫，心中充滿了生不逢辰的感慨時，其中一人向我們提出要錢上岸抽「白麵」（大烟）的要求，二人嬉皮笑臉地鼓動如簧之舌，謂如蒙賞賜得赴岸上烟館一飽，則日間必精神百倍，也可快點到涪陵。這時使我回想起在貴州服役青年軍時聽到，以及在忠縣鄉間組訓民衆時親眼看到，抽大烟或鴉片烟的惡習，在西南各省還是非常猖獗，鴉片戰爭過去業已一百多年，當時林則徐痛陳烟害的警語猶在耳邊，國民黨執政以來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努力和苦心，以及後來三令五申的禁烟法律，居然還沒有把這戕害民族健康的惡習禁絕，可見民智不開和政令難行的事實。我在忠縣鄉間，有一次恰逢某紳糧收媳婦，被邀作客，居然看到到處都有人拿着烟槍大搖大擺地抽吸，而主人更特闢房間數處，招待貴賓躺臥在床上吞雲吐霧，甚至還恭請我「督座」也來吹扒一番。當我謝絕後，陪

同我的鄉長見告，鄉間有產階級仍多醉生夢死之徒，不要說吹大烟是表示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標幟，甚至女兒出嫁，先要問男家有幾枝烟槍。烟槍愈多表示愈有地位，愈有地位，便愈可娶到好的姑娘。我的天呀！難怪我們的國家社會近代化不了，也難怪外國人叫我們東亞病夫啊！

當船伕們提出這不情之請以後，我們實在也沒有辦法，既不能依法究辦，也沒有時間從事禁烟宣傳，我們只希望他們把船開動，早點到達目的地。我開了他們一點玩笑說：「你們不知道抽大烟是犯法的嗎？我是政府官員，不怕我槍斃你們嗎？……」你猜他們怎麼回答：「長官！當烟癮發作的時候，就是被槍斃也要抽啊……！」我與那旅伴只好各拿出一些零錢來，讓他們上岸去過癮一番，不到半小時，只見他們果然笑容滿面，跳跳蹦蹦地回到船上，拿起槳篙，把船撐離岸邊，繼續我們的航程。

那位青年軍官在第三天的下午約離涪陵還有二十里的地方下了船，回到他的故鄉去了。臨別依依，彼此祝福，萍水相逢，共同度過了患難的兩天，也算得是有緣了。這時，岸上的行人漸多，似乎是從涪陵疏散還鄉的。據他們說，涪陵已成了一個空城，只剩下一些駐防的軍隊了。

我們繼續沿長江南岸西進，還得渡過一條烏江，才可進城（涪陵位於烏江與長江匯合處）。當我們到達烏江時，已是深夜十時，不見燈火，但可隱約看到城邊江航碼頭上還停着一艘大輪船，坐東朝西，船頂上還燃着一盞昏暗的燈。我心中激動不已，好像這盞燈便是我的救星一般，因為我想那船必定是赴重慶的。船伕們原想把我放在烏江的東岸下船，明天再渡江進城。我怕失去搭乘那輪船的機會，堅請當晚送我過

江，以便探詢究竟。不意船還只是過渡了烏江一半，一陣機關槍便朝我們掃射而來，打得水花四濺。隨後只聽到對面的哨兵高叫「口令」、「口令」。船伕們被嚇得魂不附體，高呼救命。我叫他們閉嘴，然後跑到船頭答話：「同志們，我是從萬縣綏靖公署派到重慶去公幹的，不知口令，請讓我靠岸供你們檢查！」槍聲停了，打水的槳聲清脆可聞，劃破了黑夜的沉寂，對岸幾支手電筒，不斷向我們照射過來。

登岸見到哨兵和他們的領頭——一位年輕的楊排長，他聽我說明和看過我的證件後，熱情地把我帶到他們的哨棚，拿出一些他們吃剩的豆腐蘿蔔之類要我消夜。楊排長並告我前方軍事失利，他們是屬楊幹才軍，駐防烏江流域，明晨還有最後的一班輪船開重慶，要我就在他們哨棚內由兩張方桌搭成的床鋪上睡覺，明早由他送我上船。我聽到這番話，一則感激不盡，一則感到安心，加上疲倦，竟通宵熟睡，要不是那好心的楊排長把我叫醒，我真會失去搭船的機會啊！醒來喝了一碗豆漿，天還未亮，楊排長便領着我向輪船碼頭走去。一路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口令」之聲不絕，都由楊排長應付妥當。半小時後到達長江南岸的碼頭，發現一條長約半里的長蛇陣，都是按秩序等待上船去重慶的人。這裏有駐軍維持秩序，一點也不亂。楊排長見到長蛇，知如果按照秩序，恐怕我輪不到機會，因為我們到達時，船上的乘客已經很滿了。於是他帶我直赴船邊，由他向守衛船梯的同志報告我的情況，獲准優先登船。

匆匆握別，我欲以銀洋一隻相酬，他說：「同志，你簡直是侮辱我嘛！」我含着感激的眼淚，目送他離船返岸，消失在街衢巷尾中。

鄉人易君左先生過涪陵時曾有詩云：「緯夫涉水輕，萬疊山巒壓，白鷺掠頭飛，青魚穿脛滑。江心大風浪，萬樹銀花發，飄然過涪陵，直下瞿塘峽。」這詩寫於戰後還都的路上，其情感受自與我逃難西湖過涪陵的情景大為不同。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

船上擠滿了人，自然談不到坐位，我拎着包袱，在甲板上想找一個角落把包袱放下墊坐都不可得。最後終於在船尾側所邊找到一個空隙，隨即佔住。這時船已啓錨離岸，拋下了大羣絕望的乘客，是難民還是軍眷，殊難分辨。

船在江心鼓浪西溯，兩岸景色在晨熹中顯得特別清新，遠山挺出高聳的胸脯，和那起伏伏數不清的山脊，輪廓分明。岸上又不時出現「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畫面。景物依然，江山如舊，只是心情與半年前東下時完全不同了。半年前儘管大局已經惡化，我仍舊抱着希望前往川東。那時大江以南和西南半壁河山仍舊在握，大可有爲。想不到在李宗仁的「領導」下，和談未成，民心盡失，軍無鬪志，社會動搖，才不到一年光景，便成了土崩魚爛的局面。連他自己也失去了信心，而遠走高飛，逃亡到海外去作寓公了。

我坐在船尾，不時凝視着從馬達裏翻滾出來的水花，回想一年來國事的變化，心中充滿了「孤獨異鄉

人……那堪正飄泊」的情懷，想着，想着，不禁潸然淚下。旁座的人，知道我有滿腹辛酸，也有來搭訕的。大家命運相同，徒悲國事之難馴而已。

同行的人中，也不乏惟恐天下不亂甚至歡迎中共的人，一有機會，便從事宣傳，把國民黨的失敗如數家珍，印證歷史上改朝換代的事實，認爲大勢已定，無須再存二心。這些說客似乎擁有一些聽衆，因爲那時大家都是六神無主，無所適從，一有人談時局前途，便覺得是在迷失了道路方向的大沙漠中見到北斗七星似的。我雖然從理論上有充分的知識與他們展開辯論，如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共產極權將剝奪人民自由等等，但覺得事實上拿不出證據來支持我的理論，如談「民主」「自由」的高調，是沒有人聽得入耳的。

記得在忠縣的一次鄉民大會上便曾遭遇難題。「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是吃飯和活命，民主自由既不能吃，國民黨也沒有給我們，要它幹什麼？……」一位鄉民代表這麼說。這自然是膚淺的說法，但也是現實的問題。你不能餓着肚子叫民主自由啊！我被反駁得失去了說服的力量。直到三十多年以後，國民黨在臺灣的成就，才提供了最好的答案，連中共領袖人物們也不得不承認失敗，而喊出「向臺灣學習」的口號了。可是一九四九年的大陸情形，固然是因八年抗戰和內亂的結果，但其民窮財盡的悲慘景況，比今日大陸也好不了多少。致使人民對政府失望之餘，對中共的「解放」諾言心存幻想，這是必然的。不過那時的經濟失敗，國民黨還可找到有力的藉口和事實來推脫責任，諉過於人，如八年抗戰和中共作亂等等。然而中共

統治大陸三十多年依然故我，甚至每下愈況，則是實無旁貸而且找不出理由諉過於人的。加以國民黨在臺灣繼續輝煌，儘管龐大的軍費佔了預算的大部，仍舊能把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到大陸同胞的十倍，不但提供了客觀對比的事實，而且也足以作為推卸他們在大陸戰後失敗的有力理由。兩種理論和制度的優劣，只有在這種以事實為基礎，以時間為證人的情形下才可顯出。這時，一切宣傳，一切說客都是多餘的了。然而，在一九四九年那種情形下，國民黨在現實環境的沙堆上失去了站穩腳跟的基礎，而中共的空中樓閣却掌握了民心贏得了江山。

在船上最為人注意的，是一些幾個月前在華北、華東戰場上被中共俘虜的國軍士兵幹部，在經過中共一番洗腦後，統統被釋放還鄉，成了中共的代言人。他們把所受到的「優遇」，以及在「解放區」看到的「好事」，現身說法，最是迷人。因為當時許多未親近過共產黨的人，對他們都還存有恐懼心理，經過這些放出的俘虜這麼一說，個個都不再存戒心了。這樣，中共的兇焰還不能勢如破竹嗎？但後來三十年的事實演變，三反五反、下放勞改、文化革命等等，才又反證當時這些頭腦簡單，沒有政治知識和哲學修養的人，包括為中共宣傳的所有同情者、同路人，如被釋戰俘、不滿現實的文人墨客、失意政客和惟恐天下不亂的人，甚至也可包括那些曾是中共領導階級的人，如劉少奇、彭德懷、黃克誠、林彪、四人幫和其千萬黨羽等等，所幻想和宣傳的非是。

這期間，國家和個人所付出的代價也實在太大了。等了三十、四十年，的考驗才揭曉，時間也實在是太長

了。正如中共偽副總理陳雲在痛陳中共三十年的失敗時說：「人生有幾個三十年？」中國人民還要再等三十年來分清黑白和是非嗎？幾千年來，中國人民便是這樣糊里糊塗地被統治者所愚弄，一代復一代地忍耐、等待、犧牲，永無生路。還應該再等待容忍下去嗎？

在嘈雜聲中，大概是下午三、四點鐘，不知不覺到了重慶的鄰縣長壽，有許多人要下船，報僮叫賣著重慶出版的日報，隨手買了一份來看，知道蔣公還沒有離渝，心爲之定，因爲見到家叔的機會大概是沒有問題了。船在長壽卸人後續航，於暮色蒼茫中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我形單影隻地進了城，只見滿街雜亂，人如潮水。但這不是盛世的熱鬧繁榮，而是亂世的緊張慌亂。城裏的人扶老攜幼向城外逃，城外的人也有向城內逃的，加上前方敗退的散兵游勇，到處都是。我原打算先找一個旅館或客棧住，再圖與家叔聯絡，豈知所有旅舍不是關門，便是奉令拒收客人，大概是怕亂民或匪諜滲入搗蛋吧。我孤獨地混在人流中遊蕩了一個小時，見到那高聳入雲的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別來無恙。作了一番巡禮以後，經過附近一家澡堂，門是開着的，便走過去與老闆接頭借宿，他看我不像壞人，允我在澡堂的躺椅上過夜，並許借用他的電話，與在林園官邸的叔父取得聯繫。

家叔自然是驚喜交集，問道：「你們是不是不戰而退了？……」我只好說：「六叔啊！說也慚愧，我們手無寸鐵，又無單位可屬，欲戰無從呢！……」他當即指示明晨去五四路一位他的朋友處待命。那天好像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五日，下午搭交通車赴官邸晤見家叔。自一九四六年在貴陽黔靈山一晤，才短短

三年，國事盛衰滄海桑田，如同隔世。林園官邸是蔣公駐節處，軍政要員出入頻繁，共軍雖已進逼城郊，但看不出有一點緊張亂象。據聞蔣公仍鎮靜如常運籌帷幄，調兵遣將，作與匪背水一戰的打算。無如民心士氣已一蹶不振，川湘鄂守軍受共方心戰攻勢不戰而潰，堅強的胡宗南大軍從遙遠的西北兼程南來，不及整備，共軍已至。終於西南、西北半壁河山，爲共方輕取。我承家叔之介，於廿六日隨搭當時監察院于院長右任和司法院居院長正的專機，經廣西南寧，於廿七日抵臺，逃脫了被中共奴役的命運，開始了新的生活。三十年來，個人從一個高中沒有畢業的散兵游勇，受國家的培育，大學和研究院畢業，尸位外交界十餘年，嗣復得美國南方浸信會之資助，完成博士學位，又執教彼邦大學十餘年矣。這種個人的成長和發展，只有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和政府統治下才有可能啊！

此期間爲國宣勞之功固不足道，而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上，自覺當不後人。人生幾何，得來虛度，夫復何求。至於國家，經此三十餘年的巨變，隔海而治，成敗善惡是非亦已昭然若揭，今後中國人民自處之道，自無須再事躊躇。只要從善如流，擇善固執，向成功的一面看齊、效法，便可與其他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共享富強康樂、長治久安的「人」的生活。筆者有幸目覩此一歷史洪流的怒潮澎湃，倖生至今，且能略盡一己微弱力量，盡瘁國事凡二十五年，雖無成就，但可不負此生，實亦萬幸。飲水思源，父母鞠育之恩，家叔提攜之德，國家培育之功，不可不再三申謝，以誌不忘。至於來臺後之發展，個人事業與國家世界演變，待述之事繁多，當俟他日課業稍閒時提筆憶述，另出一、二書，以報讀者。